

為黨國祭旗： 1950年陳立夫去國的檔案視野

王良卿

摘 要

1950年，國民黨政權正式遷臺未及一年，黨部組織事務最重要的代理人物陳立夫突遭蔣介石指令前往美國，從此遠離黨政核心舞臺，翼下CC系成員也備受抑制，黨國體制上層結構隨之朝向派系替代，並獨尊蔣領導威權的改革主軸而翻整重塑，影響堪稱深遠。本文採取不同於以往憶述材料導向的視野，利用臺灣、美國兩地檔案館的豐富典藏，兼采人物日記、憶述文獻、臺港報刊資料，將陳氏去國一事放在國民黨渡臺初期的特殊結構與時代局勢、政權流離所面臨的諸多困境與反應，以及黨國體制盤整重建之際以蔣介石、陳誠為政務核心的權力延展企圖來進行綜合考察，旨在說明蔣的去陳之舉是國府統治形勢內外俱張的交疊產物：一是美國方面屢屢提示人事黜免的意見，佐驗蔣的改革決心，視為援助的前提；二是黨國體制遷臺重建之初，究竟該如何估量派系代理的職能表現，及其結構性角色的再安排。此外，本文運用一手檔案，對1950年陳立夫的最後行止和CC成員的內部動態與集體心態，提出了較為豐富而新出的析述；也提示了國民黨宗派主義中的政治耳語文化，認為值得學者結合一手檔案等多元史料進行深入考掘；並指出陳立夫去國之於體制上層的重大效應之一，在於開出了CC分子「公道情結」與體制內異議的混同循環，正是1950年代宗派主義披上民主道德外衣，揚舉國會制衡的理念而繼續抵擋黨國體制行政權擴張的主要動力，也可看出一些從黨國派系代理結構的內部裂變所傳出的政治異音，對於我們思考戰後臺灣民主自由「如何可能」的一頁演進史時，似乎仍是值得重新認識、參照的重要背景課題。

國史館館刊 第 54 期

關鍵詞：陳立夫、蔣介石、陳誠、國民黨、CC系

Chen Li-fu's Political Exile in 1950

Liang-ching Wang*

Abstract

In 1950 the Kuomintang regime had just moved to Taiwan. Chen Li-fu, the most important agent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affairs, suddenly received an order from Chiang Kai-shek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would remain there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Chen's departure led to a re-shaping of the Kuomintang's personnel and faction alignments. This article takes a fresh look at Chen Li-fu's political exile with the help of rich source materials from archiv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aries and memoirs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t argues that Chen's downfall was the product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tensions confronted by the Kuomintang at the time: First, the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reform; Second, the need of the Party to re-assess and re-arrange factional rol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new analysis, based on first-hand sources, of the dynamics and collective mentality of the CC Clique in 1950, the legacy of which would shape the complex roles its members played in Taiwan's politics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whisper culture" in Kuomintang faction politics,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Keywords: Chen Li-fu, Chiang Kai-shek, Chen Cheng, Kuomintang, CC cliqu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為黨國祭旗： 1950年陳立夫去國的檔案視野*

王良卿**

壹、前言

在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CC系是最能標舉「黨權至上」精神而伺機擴張政治影響力的一支擁蔣派系。這個派別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與蔣介石帶有通家情誼的世侄輩）為首，崛起於容共後期、清黨時期，不僅協助蔣介石清洗、進取黨部組織部門，也替自己掙得了政治起家的基本腹地。隨著國民黨完成北伐，實施訓政，CC延展至政府部門，特別在民政、地政、教育、新聞、情報、黨國資本事業等許多領域，頗見活動能量。行憲後，許多CC分子經由各地選舉進入中央民意機關，在立法院內尤其與一批黃埔系、復興社、三青團等背景的立法委員互為頡頏，並響為院內二大勢力。

早期的CC秉持黨國思想優位的政治態度，強調黨部做為政治發動機的角色，內部凝聚力強，與黨內其他派系有欠調和，共黨尤其銜恨，也不受自由派知識分子與美國行政部門的欣賞，咸視為國民黨的最大保守派別，惟仍不減其政治

* 本文根據2017年6月25日出席國史館主辦「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文稿改寫而成。承蒙會議與談人張力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特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7年9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10月25日。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聲勢。然國府正式遷臺未及一年，陳立夫突遭黜免而流寓美國，CC成員也在黨政空間備受壓抑，炎涼之比，不可以道里計，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上層結構也隨之翻整重塑，影響堪稱深遠。關於1950年的陳立夫去國之謎，是否只是單純為了辦黨不力或丟失中國而負起政治責任，是否值得放在國民黨政權託寄臺灣初期的特殊結構局勢當中求取進一步解答，對此，傳統取材自憶述資料的視野所能見到的，似乎還是顯得局限而蒼白得多。

坊間提到陳果夫、陳立夫晚年行止的通俗傳記甚多，談到CC在臺命運的也不少，但我們卻不太能透過這些建立在憶述文獻等二手材料基礎上的作品，較好的考察各方人物做為歷史行為主體的多面性格與複雜動態。¹ 一直以來，寫作者反覆使用蕭錚、陳立夫等CC要人的回憶錄，左右了我們對二陳兄弟和CC在國民黨臺灣時期活動的基本認識，但這些憶述文字普遍帶有派系本位的言說立場，既存在著選擇性書寫的毛病（例如片面強調促成陳誠組閣之公忠體國），也常看到主客行動關係易位的扭曲表述（總說陳立夫主動要求不再辦黨、請求出國等，其實都不正確）。近期根據周宏濤日記和口訪所得而整理刊行的周氏回憶錄，頗能揭示若干新出情節，但視角自是傾向士林官邸一側。此外，這些材料時有舛訛，也側重派系鬥爭，對於國民黨渡臺初期的特殊結構與時代局勢少有鋪陳的興趣，更無法充分解釋政權流離之際所面臨的諸多困境與反應，甚至是黨國體制盤整重建之際以蔣介石、陳誠為政務核心的權力延展企圖。

¹ 自1990年代起，這些通俗作品一直盛行於中國大陸書市，部分在臺灣可見繁體版。諸如：陳廷一，《陳氏家族全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張振華編著，《民國第一家黨：陳氏家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范小方，《陳家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楊者聖，《國民黨教父陳果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張陽、胡移山，《陳果夫、陳立夫與蔣介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范小方，《國民黨兄弟教父》（臺北：靈活文化公司，2008年）；張學繼、張雅蕙編著，《陳立夫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李海生、張敏，《民國兩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西岳、蘇學文，《陳氏家族全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劉晟、方克、田青，《陳氏家族秘史》（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王學慶，《蔣介石與陳立夫兄弟》（臺北：日臻出版社，1995年）；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范小方、李永銘，《陳果夫與陳立夫》（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年）；范小方，《蔣家天下陳家黨：蔣介石與陳果夫、陳立夫的謀略藝術》（臺北：周知文化，1994年）；范小方，《二陳和C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某種角度而言，陳立夫的去國，正是上述結構局勢、困境、反應、企圖交織下的結果。因此，對於這個課題的再認識，從舊有資料突圍，再行擴展史料來源，仍有必要。本文利用臺灣、美國兩地檔案館的豐富典藏，兼采黨政人物日記、憶述文獻、臺港報刊資料寫成。在檔案方面，以國史館藏蔣介石、陳誠個人檔案與相關整編出版品，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藏蔣介石、程天放日記手稿做為引用主體，兼及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大溪檔案黨務類》，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藏院會速紀錄，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雷震、傅正檔案》等。關於《蔣介石日記》，學界知之甚詳，茲不贅述。至於程天放的日記手稿，係由獨女程琪在2007年（程天放逝世40週年）連同生平其他文件捐贈給胡佛研究所；記事起迄範圍為1935至1967年，總體涵蓋了教育、外交、黨政等主要經歷；本文引用的是1950年日記主人來臺後的春、夏兩季手寫內容，其勾畫CC內部動態與集體心態之詳，最是可觀。

貳、美方持續施加去陳壓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日戰爭匯流後，美國以盟國領導姿態介入中國政局，其外交部門同若干學術、媒體工作者一樣，往往貶抑CC所持黨國本位的思維、作為，常冠以「反動派」之名（“reactionary CC clique”），戰後甚至視為中國邁向國共和解、政治民主化的巨大障礙。² 1947年8月，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建議蔣介石讓陳立夫出國考察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蔣笑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等選舉將近，他不能沒有陳立夫。³ 惟行

² 戰時、戰後美國外交文件顯示，駐華使館官員（包括大使高思、司徒雷登在內）經常使用「CC反動派」一詞描述，例如：“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8, 194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 6: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 448;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19, 194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 70.

³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 19 and Sept. 12, 194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p. 256, 283.

憲後，政府新人事呈現杌隉之象，1948年4月的副總統選舉結果尤其悖離蔣介石意向，既忿於黨籍幹部未能悉聽號令，尤其明示陳立夫應該負起政治責任。5月，陳競選立法院副院長，目睹立委一片反制，曾聲稱當選後即辭職出國。其後，蔣介石提名行政院長一事又受阻於黨內派系傾軋，認為CC居間操弄，歎曰「立夫變態之快」。據此，司徒雷登趁勢建請解散CC，獲蔣大致同意之回應，果然也多少促成了陳立夫出洋考察美英等國3個月。⁴ 其後，陳返回中國政壇，國府繼續承受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要求剷除CC政治能量的口頭壓力。⁵

1949年國民黨政權輾轉流離之前，陳立夫在形式上早已脫卸了幾個黨政要職，甚至沒有進入蔣介石下野後在臺北所成立的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多功能隨侍組織：總裁辦公室。⁶ 這年冬天，陳還保有的主要頭銜是中央常務委員、中執會非常委員會委員、閻錫山內閣的政務委員，基本上算是沉潛之身，但馬上又受到美方進一步的衝擊。11月，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麥克唐納（John J. MacDonald）面見蔣介石，轉達國務院對臺灣態度，主要取決於島上中國政權能否建立有效統治，帶給人民更高的政經福祉，至於更多的援助將視國府的未來表現而定。⁷ 同月，國防部次長鄭介民銜蔣之命，在美商談軍事援臺等問題。此行，與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Oscar C. Badger II）正式會談時，得知美方建議起用吳國楨主持臺灣省政，以示國府改革意念與合作前提。白又以口頭備忘方式，指明孔祥熙、宋

⁴ 綜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4,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 255;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370-380、388-389、431；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頁221-232。

⁵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49年6月10日條，頁343。

⁶ 1948年出國前，為承擔黨令貫徹不力的指責，早已辭卸中央組織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兩個黨職。回國後，因進入孫科新內閣擔任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又辭去立法委員，至於立院副院長一職當然同步卸除。

⁷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Oct. 28, 1949), and “The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3,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 402, 406-407.

子文、陳立夫丟掉中國的政治責任，要求擯棄不用。⁸ 對此，總裁辦公室高級幕僚頗表重視，認為「不宜久擱」，唯恐「人事不能滿足美方之期望」則彼「將採取放棄態度」云云，蔣不能無感。⁹

12月，美方對國府人事的提點，在臺北政治圈內，透過鄭介民廣泛的一手傳布，儼然成了不宣之秘。吳國楨的人事任命果然成局，尤其動人想像。¹⁰ 孔、宋本不在臺。至於陳立夫，蔣介石則考慮排除他在國民黨將來改造過後的角色作用，以明責任。17日，蔣、陳會面，研商國民黨組織及改造等問題。¹¹ 當天會談詳情，目前未見資料揭露。可確定的是，這時蔣介石綢繆「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已動念廢棄第六屆中央委員所代表的黨統，「澈底解散」國民黨，再造新黨，統一意志。¹² 耶誕節後，蔣在日月潭糾集一批總裁辦公室骨幹，連同部分親信（含陳立夫）共商前述「毀黨造黨」構想，打算落實為可行方案。31日，明潭會談猶在持續時，再與立夫單獨研討「重新組黨之要旨」，強調係在「湔滌領

⁸ 「鄭介民與白吉爾談話紀錄」（1949年11月17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43-079；「唐縱致蔣經國電稿」（1949年12月1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62-006；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1949年12月9日條，頁471-472。

⁹ 「不能滿足」，總裁辦公室第七組組長唐縱語：「唐縱致蔣經國電稿」（1949年12月1日）、「不宜久擱」，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王世杰語：「王世杰電黃少谷電稿」（1949年12月6日），〈對美關係（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06-278。蔣不能無感，參見：「蔣中正致陳誠電稿」（1949年12月7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27-041；《蔣介石日記》，1949年12月11日條，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7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29。

¹⁰ 「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紀錄」（1949年12月1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業務會報紀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110701-00010-020；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1冊（臺北：桂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949年12月1日條，頁375；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1949年12月9、15、17日條，頁472、474-475；《黃鎮球日記》，1950年1月2日條，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¹¹ 「蔣中正據閩錫山報告」（1949年12月17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59-017。

¹² 《蔣介石日記》，1949年12月27、30日條。

袖與幹部過去之錯誤」，凡行動生活與思想精神不能與共黨鬥爭者，「上自領袖起，皆應自動退黨」，而讓「有為之志士」承當重任。¹³

蔣介石的話涉及國民黨政權南渡的政治責任歸屬，帶有濃厚的傾向性。言者有心，聽者不能無意。據陳立夫回憶，政府遷臺後，有一次他在日月潭告訴蔣：「黨未辦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責任推給我兩兄弟，將來改造後，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參加，庶幾總裁可以重振旗鼓。」又，憶稱：「對此意見總裁未予置詞」。顯然，指的就是這次對談的部分情節。¹⁴不過，陳立夫的回憶突出了自己在辦黨責任上願意棄車保帥的悲涼況味，可全然沒有寫到美方要求黜免他的壓力背景，更未提到自己的話其實是接在蔣的暗示後頭（蔣聞後默然可證），無非一種特殊語境脈絡下的被動反應。

叁、CC的進取與自衛·政壇的耳語與追剿

政治耳語是政治文化必難免除的一部分。國共內戰尾聲，偌大的黨國體制遷入臺灣盤整，政經軍情俱見飄搖，透過權力場域內外的人際傳播，尤其瀰漫各種畛域之談，謠諑、讒譖也非偶聞。特別是美方要求指明陳立夫政治責任，正與若干國民黨人厭陳反陳的觀點不無暗合，在在助長了黨內派系順勢追剿的耳語；另一方面，也讓CC保衛、爭奪，甚至擴大一己政治資源之餘，適足令人側目再三，私議私語，形成惡性拉鋸循環。其中，尤以CC挑起或捲入的黨政人事安排、政治忠誠生疑、黨務改造期程延宕、黨國資本事業整頓不力等爭端，最是動見觀瞻，橫生暗潮，時見衝突。

¹³ 《蔣介石日記》，1949年12月31日條。

¹⁴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380。蕭錚也聽陳立夫說過這件事。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1980年），頁340。這是蔣介石繼1946年10月後，再次造訪日月潭。

一、陳立夫的人事進取及政壇不滿

整體而言，在國民黨內，CC是一支高內聚力的派系，它的成員對黨治的理念具有高度信仰，咸以黨的「忠實同志」自命。不過，國民黨一黨訓政後，黨機器未必籠罩黨國政治體系的一切，尤其「黨政似成為兩個重心」。¹⁵有鑒於此，CC幹部曾向蔣介石申說以黨治國之意，指出當由忠實黨員擔負重要治理責任，可算是反映了這個群體在主觀理想、現實利益與結構環境交織下的某種「出路情結」。¹⁶1948年，陳立夫回應蔣介石對於他無能節制僚屬的指責，強調幹部已怪他過分服從總裁，致使大家毫無出路云云，正顯示：其一、這個黨內群體對於憲政新局的適應，懷有不可言喻的集體焦慮；其二、這名派系當家似乎相信，幫忙同志籌措前途，也是份內之事。¹⁷

（一）經濟部人事改組

國共鏖戰至最後關頭，國民黨政權在海外（特別是香港地區）的人事、資產雙雙面臨政治忠誠與個人利欲的嚴峻考驗，形成國共鬥爭的又一場域，經濟、交通事業遭受衝擊尤大。1950年1月，行政院為整飭機構人事，進行局部改組。其中，經濟部長劉航琛原本親炙代總統李宗仁，因為資源委員會存港資產管理等爭議，招致蔣介石「異常關切」，身陷逾權違法疑雲，遂由嚴家淦取代其職。¹⁸嚴在戰後主持臺省財政工作，對於實施未久的幣制改革著力尤深，與東南軍政長官、前臺省主席陳誠交善。不過，他雖由蔣介石親自拍板而出線，接下來卻因為

¹⁵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年），頁330。

¹⁶ 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115-116。

¹⁷ 《蔣介石日記》，1948年5月21日條。又如1949年，閻錫山籌組內閣，CC有以否決居正提名案居功者，要求酬以部會。閻親找陳立夫解釋，又遭代總統李宗仁質疑「似為CC派所包圍」。依違之間，均感傷神。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1949年6月10日條，頁342-343。

¹⁸ 宋子文的舉報：「宋子文致蔣中正電」（1949年12月5日），〈經濟報告(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8-005；蔣「異常關切」：「黃少谷、谷正綱致閻錫山電稿」（1949年11月12日），〈經濟報告(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8-005。關於劉航琛的自述與自辯，參見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訪問，張朋園、劉鳳翰紀錄，《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123-131、151-172。

陳立夫關切部內人事而備受困擾，必欲對外一吐為快。¹⁹ 陳誠1月3日日記：「嚴靜波面告，陳立夫對他說渠以經濟部讓嚴，但對人事須由陳作主。」附筆：「豈有此理」。²⁰ 雷震6日也記道：「據嚴家淦說陳立夫找他去，謂經濟部長原係他的，因對外關係，他不便出來，希望他保留尹靜夫之次長，及以後用人注意黨內人才，因他們對國家忠實。」

陳立夫的關說壓力，透過嚴家淦一批當事人私下傳述，容易讓聽者解讀成是某待罪派系的某種「擴大內需」企圖，在政權已然「浮於海」的局面下，分外招惹疑忌。²¹ 徐復觀指出CC到臺灣後仍是「狹隘自私」，舉例表示他們對蔣介石成立總裁辦公室一事流露怨望，曾說「辦公室的人幹，我們就都不幹」，又對陳誠方面人士來臺後「都得到招呼」而大發牢騷。徐反求「臥薪嘗膽」之義，而有「借題發揮，那便大可不必」之勸，所謂「天下紛紛，正是此輩」，大抵也是某些政學界人士給的評價。²²

（二）油輪公司接收風波

劉航琛職位不保之際，經濟部所管中國油輪公司總經理李允成，亦遭指控涉嫌投共資敵而被捕。案發前，陳立夫以政務委員身分敦促行政院長閻錫山採取作為；案發後，則向閻推薦立委周厚鈞赴高雄善後接收。但當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設有航務委員會，經管相關事務，軍政長官陳誠不滿所謂投共傳聞，認為CC厚誣於李。²³ 對此，雷震一本「搶位置」觀點，發抒感聞：「石油公司李某

¹⁹ 蔣的拍板：「事略稿本」，1949年12月17日條。

²⁰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1950年1月3日條，頁713。

²¹ 事實上，雷震也聽聞教育部長杭立武告訴人說，陳立夫請他發表李煥之為次長。雷誌感「今日CC猶來搶位置，大家非常不滿」之餘，再記：「據嚴家淦謂美國來此調查之克拉克說，此問題是陳立夫之天下，因其有關係之位置有二十二個也。」見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1月6日條，頁9。

²² 徐復觀，〈第三勢力問題的剖析〉，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編》，第6冊：兩岸三地卷（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39。

²³ 「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1月14日），〈經濟報告（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8-006；〈李允成計劃投匪被捕〉，《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1月6日，版2；〈油輪公司案〉，《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1月7日，版1；〈油輪公司業務〉，《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1月19日，版1。

（總經理）一事，完全係CC搶奪位置，因所派去接收者為周××，乃一聲名狼藉之人物。據聞此事經過甚久，最後由陳立夫請閻院長下令免職也。」²⁴ 陳誠的觀點不殊，以電話告知行政院秘書長賈景德，如周厚鈞接收油輪公司，當即扣留，又記：「周是CC，幹CC，欲搶奪油輪公司，告該公司總經理李永〔允〕成為共匪，此種手段實太可惡。」²⁵ 又訪雷震，極不滿CC搗亂，雷慰以「忍辱負責」。²⁶ 這事驚動了蔣介石，使得陳立夫寫了函呈解釋，強調純粹是職責範圍內之建言，否認介入全案處理過程；還將自己蒙受的「誤解」、「臆測」、「誣陷」，指向陳誠方面所為，表示經賈景德告知，「乃陳長官欲逮捕政府所派調查接收之人員，事遇障礙，並生誤解」，「始知東南長官公署與該公司之關係，而外間對職忽多臆測之傳說，跡近誣陷，查亦出之于同一之來源。」²⁷

（三）省府人事薦舉耳語

又如吳國楨接掌省府小內閣後，部分人事安排未符輿情，民政廳長蔣渭川、建設廳長彭德2人尤其處在箭垛之中。政界盛傳陳立夫介入蔣、彭人事，惟其一貫否認。徐永昌同為行政院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對陳的意態，記有一手觀察：「陳立夫說……臺省府改組，渠從未過問，乃有人謂某某不滿人意之幾委員、廳長由渠提薦，言下至為憤憤。」²⁸ 又記：「有謂蔣、彭等乃CC所舉，日前陳又誓言其冤。」²⁹ 1月22日，行政院院會決議更換省府民、建兩長人選，至於蔣、彭另有任用。徐永昌筆錄院會動態：在吳國楨即席報告風波始末，自嘆「所以此次改組最好連主席亦改組之」後，陳立夫發言表示此可證明當初自己並未干預。但令徐永昌疑惑的是，既然如此，陳又為什麼接著主張「對蔣、彭應有下文，以平其氣」呢。³⁰

²⁴ 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1月6日條，頁9。

²⁵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1月3日條，頁713。陳誠的反應，並見《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頁127-128。

²⁶ 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1月3日條，頁5。

²⁷ 「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1月14日），〈經濟報告（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8-00008-006。

²⁸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1月13日條，頁7。

²⁹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1月14日條，頁8。

³⁰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1月22日條，頁10-11。

二、CC要角政治忠誠見疑

(一) 自由中國勞工同盟收編事件

1950年1月15日，陸京士（國民黨官方工運的著名代理人之一，時任中央農工部副部長、工界立委，CC）在臺北領導成立「自由中國勞工同盟」。考慮到特殊的時機因素，不難發現這個團體的重要意義在於：1. 它針對一再遷徙而羸弱不堪的官方工運體制（如中央農工部、全國總工會，及其關係網絡、動員基礎等），自外部提供了某種中繼救援的可能。據此，陸京士喚回了昔日各省市總工會、單項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戰友，也試圖串聯冷戰秩序下的國際右翼工運組織，尋求西方社會的支持。2. 但從盟員吸收範圍和組織理念、原則、架構等方面看來，它更像是某種面向國內各階層的、積極肩負反共使命的、類似國民黨金字塔型結構的特殊人民團體，而非一個純然內閉性的職業社團組合。這時，黨內菁英多已聽說蔣介石有意解散國民黨，而一個開放性同盟的適時成立，是否要替「毀黨」後的CC預留再適應、再活動的政治資本，亦足引人遐想。不令人意外的，臺北政壇瀰漫著同盟將是一個嶄新政黨的耳語。在蔣介石要求給予「正確之領導與有效之掌握，俾不致走上獨立政黨之途徑」的指令下，國民黨中央提出了幾項統制意味濃厚的掌控措施。對此，陸京士自謂「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認為是派系構陷，使他蒙上政治忠誠度的質疑，誓稱：「京士生為三民主義之信徒，死為三民主義之鬼，此志不渝，天日可鑒。」³¹

(二) 中央海外部副部長易人事件

國民黨政權遷臺之初，極講求剔除有礙於黨國共同體凝聚和延續的政治疏離分子。1950年3月23日，中常會通過「非常時期管制出國人員要點」，限令中常委凡滯留海外者，應依期抵達臺灣，否則取消資格。絕大多數的被指涉者未按要求辦理。倒是旅加的潘公展和旅美的賴璉（CC「唯二」滯外的常委，賴兼中央海外部副部長）均三度致函常會，一再申辯自己戮力於海外工作，而以「公道是非」質問中央。賴璉的語調尤為倨亢。一年多前，他在立法院猛烈質詢行政院長翁文灝，導致蔣介石不諒，被迫去國。其後，在美國聯合于斌、曾琦等人進

³¹ 自由中國勞工同盟收編事件始末，詳見王良卿的討論：《改造的誕生》，頁385-396。

行超黨派救亡運動，組成反共名義的民主自由聯盟（Association for Free China, Inc.），寄望「搶救民國」，爭取國際輿論。聯盟成員來自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華裔黨員，與中、美兩國無黨派人士，賴負實際工作。這樣一來，臺北方面開始形成蜚語，風傳賴璉「勾結異黨」、圖謀成立新黨。就在耳語持續浸潤、賴璉並未來臺的情勢下，5月11日，中常會討論蔣介石交議的海外部副部長人事異動案，意以李樸生取代，然未獲通過。10位CC分子發言力挺賴璉，或給予同情，又以「公道」、「是非」力爭，張道藩尤其激越，連呼3次「不公道」，要求陳明總裁。25日，蔣親自主持常會，但二度交議的人事案仍然受阻。顯而易見的，一些常委是在聲援派系同僚的動機下，格外激起自己做為常委的權能意識了。此後，蔣開始連續缺席常會。³²

三、CC在改造籌議中的異音

1950年1月初，日月潭會談形塑了兩套改造方針，一是根本另起爐灶，一是重整黨機器。蔣介石為表示拋棄包袱，先已暗示陳立夫不必參與未來改造，又視中委「意見紛歧」、「靠黨營私」、「阻撓黨務」、「阻礙革新」，雅不願同葬「污坑」的態度下，催使兩案都要停止第六屆中央委員的職權。³³稍後，一個接受蔣介石委託的「改造研議小組」在臺北組成，33名成員獨立於黨中央之外，承接日月潭會談所得框架，經28次大小會議，在3月分提報了全套計畫9種，仍分甲、乙兩案。其中，甲案新黨名稱定為「中國民主勞動黨」，藉以號召工農、青年、知識分子等勞力、勞心者。值得注意的是，甲、乙兩案除了是否更換黨名以及實施程序外，其實缺乏根本意義上的差異，即使連組織綱領也差不多，也依然注入了原中委停權的決斷改革思維。³⁴

然而這段時間，更多的國民黨幹部針對改造議題各言己志，質疑亦起，也依

³² 中央海外部副部長易人事件始末，詳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396-405。

³³ 《蔣介石日記》，1949年12月30日條；〈黨的澈底改造問題〉（1950年1月2日），《雷震、傅正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G02-08-003~004。

³⁴ 〈黃少谷、谷正綱致蔣中正簽呈〉（1950年3月），《大溪檔案黨務類》，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大黨011/016。

稀可見民主作風與統制思想的角力。³⁵ 在黨中央召集的9次中央委員談話會中，CC人物的好言、敢言令人印象深刻，常標榜黨內民主：有人呼籲撤除國民黨組織原則所採「民主集權制」的「集權」二字；³⁶ 間有不滿總裁蔣介石的領導作風，主張領導人不能只以紀律做為驅策的手段，起碼「不能有厚薄」之分；³⁷ 甚至有人主張限縮蔣介石在黨內的至高權力，改總裁制為主席制。³⁸ 所反映的，正是CC面對國民黨渡海後的派系適應危機，始終難以排解的集體怨望情緒。至於蔣介石「毀黨造黨」的想法，更是從未得到各派系中委的一致支持。³⁹ 旁觀日來的眾聲喧嘩，他的解讀是：「本黨改造方針之不能實施，以人事關係，各幹部成見太深，無法使之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也。」⁴⁰ 其中，素以黨務部門為活動根本的CC，以黨內民主、公道意識相求，肯定形成了蔣決策的莫大困擾。某種角度而言，國民黨中央的確成功喚起了黨內菁英討論重大黨是的勢頭，但未能真正匯聚上下共識，蔣的領導威權同受衝擊，以致象徵新舊交替的五中全會遲遲未見這一位領導人示期召開，從而延宕了改造實施進程。⁴¹

四、黨國資本事業招致物議

國民黨政權遷臺後，困於心，衡於慮的，包括必須重建一個足以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藉以強化國家的職能，挹注龐大的財政需求。然而做為贍養資源之一

³⁵ 呂芳上，〈痛定思痛：戰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1947-1950）〉，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會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589。

³⁶ 〈在臺北中央委員談話會要點紀錄〉（1950年1月31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6.41/326。

³⁷ 「在臺北中央委員談話會要點」（1950年2月14日），〈革命文獻——戡亂時期黨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41-111。

³⁸ 「閻錫山日記」，1950年2月3日條，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錄》（臺北：編者印行，1997年），頁410。

³⁹ 「鄭彥棻致蔣中正簽呈」（1950年3月17日），〈革命文獻——戡亂時期黨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41-114。

⁴⁰ 《蔣介石日記》，1950年2月3日條。

⁴¹ 關於國民黨邁向1950年改造的過程：呂芳上根據一手檔案撰成〈痛定思痛〉一文，脈絡簡明，內容詳贍；王良卿《改造的誕生》一書，對於黨內派系和宗派主義的角色有所著墨。

的國營事業，回應這個目標的能力極為有限。⁴² 人們指摘國營乃至黨營事業的種種弊端，包括在1949年政權流離的過程中，黨國資本事業的部分財務流向不明，或有業務停頓、主事者未見在臺等情事，不免物議沸騰，監察院與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均曾介入調查，輿論同聲抨擊。對此，操盤大員陳果夫雖然自視清廉，且在臺中養痾，所負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位也已陸續獲人代理，惟以其過往的負責歷史與實際影響力，仍然成為各方集矢的目標。

（一）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疑案

例如陳果夫投入甚深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自遷臺後，器材運存臺中，1950年春天又在當地新建製片廠，新添置的攝影、錄音、沖印設備均向美國方面採購，似有一番振作氣象。然而臺北政壇頗有人關注農教公司的帳目交代問題，特別是總經理李吉辰滯留美國，雖負有採購責任，而所擁有器材、外匯不在臺北方面掌握，以致流言播散，兼董事長職的陳果夫同受波及。⁴³

（二）中央合作金庫疑案

在中央合作金庫方面，又是一個滋長類似傳言的事業。先是蔣介石接獲密報，內稱中央合庫私設機密資金，加上總經理壽勉成（國民黨中國時期官方推動合作事業的主要代理人）之前負有出國考察名義而遲未前來臺灣，業務形同停頓，導致臺北方面出現「捲款潛逃」、「擅離職守」等蜚語。3月23日，壽勉成自瑞士發函，透露了國營事業投資版圖的一個不透明地帶，藉以回應外界的「誤會與謠傳」和蔣的「疑慮」。⁴⁴ 函稱，前年夏天曾簽准設置「輔盛號」辦理鹽

⁴²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426-428。

⁴³ 「蔣經國致鄭彥棻電稿」（1950年9月15日），〈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41-014；「陳果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12月），〈一般資料——專件（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87-011。參見〈農教電影公司興建製片廠〉，《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2月25日，版2。

⁴⁴ 「壽勉成致陳果夫、谷正綱函呈」（1950年3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1-003。

業，但因時局關係，臨時改做「其他業務」。⁴⁵ 據稱，這個商號是透過中央合庫「輔助而來」，沒有法律的從屬關係。又詳細陳述「輔盛號」自上海失守，遷設香港，改稱「輔合記」後的投資失利、尚存資金，和因為「人事及人情之關係」而挪付總分支庫員工的資遣、疏散的數額，惟他也堅持「金庫為金庫，輔合為輔合」，因此一切支出均未登入合庫帳目。⁴⁶

儘管壽勉成以「縱非本黨高級職員中最窮之人，要亦為窮人之一」、「素不愛錢」自清，以「國家多難，公道猶在」相爭，經陳果夫轉呈，依然未能盡釋國民黨高層的猜慮。因為連代理理事長谷正綱都自稱不知道「輔盛號」、「輔合記」的存在，遑論其業務活動始末，乃至與央庫的法律關係。⁴⁷ 其實，壽勉成和他的派系同僚賴璉、潘公展一樣沒有選擇歸隊「來臺相共」，當然也讓自己陷入了圈內耳語浸潤的不利處境。

5月3日，蔣介石在壽勉成一案的簽呈上，批了一個「閱」。字雖簡單，其實已有定見。近來公營事業頗受指摘，監察、行政機關正在討論裁併國營金融機構，因此，壽勉成也同時將解釋函寄給了于右任、陳誠兩位院長，但都未能廓清大局。⁴⁸ 10日，蔣介石以總統身分，指定國策顧問谷正綱、杭立武、陳啓天、陶希聖、雷震，研討「中央及臺灣金融機構簡化暨人事緊縮」等問題，要求一個月內提出報告與建議。⁴⁹ 翌日，黨中央喉舌《中央日報》發表社論，以公營事業不能自給自足為慮，尤以缺乏切實監督審核為駭，要求從速整頓，大抵即是配合高

⁴⁵ 1950年代壽勉成回歸共黨中國後，曾憶述國民黨在治理上海的最後歲月中，事實上，輔盛號成了專門買賣黃金、美鈔的一個機構。壽勉成，〈陳果夫與國民黨的合作運動〉，《文史資料選輯》，總第8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頁367。

⁴⁶ 「壽勉成致陳果夫、谷正綱函呈」（1950年3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1-003。

⁴⁷ 「壽勉成致陳果夫、谷正綱函呈」（1950年3月22日）、「谷正綱致蔣介石簽呈」（1950年4月20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1-003。倒是後來壽勉成堅稱谷正綱清楚這個商號。又說，直到他離港赴歐前，這個商號還繼續支付中央合庫在臺灣部分留用人員的生活維持費，以及陳果夫、谷正綱的生活津貼。壽勉成，〈陳果夫與國民黨的合作運動〉，頁369。

⁴⁸ 壽勉成，〈陳果夫與國民黨的合作運動〉，頁369。

⁴⁹ 〈王世杰致雷震代電〉（1950年5月10日），《雷震、傅正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G01-13-001。

層意志的某種風向表示。⁵⁰

隨著蔣介石的政策指示，銀行裁併之說似將化為真實。一旦如此，包括中央合庫在內，陳果夫兄弟培植經年的金融資本體系以其所受指摘之烈，大有可能首當其衝。5月11日，陳果夫函呈蔣介石，提出一份「重建金融計畫大綱草案」，力主高層改革不宜「出於忌恨之心理」，尤其不宜「流入資本主義之途」，反映了他對於黨國金融政策或將隨著人事成見而失墜的憂慮。⁵¹這份草案體現了陳果夫一貫以「養民」為目的，協助地方、國民經濟建設與分配社會化的合作制度設想，強調國家經營的工礦農林等專業金融機關的職能，希望打造一個「隨反攻勝利而推進」的「民生主義之金融制度」。⁵²然而，這個月的下旬，臺北政壇已經掀起陳誠、陳立夫為中心的又一政爭，延燒之烈，陳果夫的黨國資本事業版圖同步捲入，再難一一力保，遑論理想。

肆、行政、立法兩院關係中的派系政治

就國民黨而言，1947年行憲之初的各項選舉，一方面既要考慮釋放若干席次給幾個參與制憲事業的政黨，藉以形塑「還政於民」的局面，一方面又要開闢出黨內幾支派系的參選空間，藉以爭取最大值的勝選優勢，惟不可避免的也開出了黨內派系惡性競爭的又一場域。中央民意機構組成後，事實上仍呈現了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以及派系山頭林立的鮮明傾向。以立法院為例，就存在著下列幾個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特徵：1. 立委各依人事經歷背景的不同而踴躍結合，導致院內的次級團體林立，各擁時局主張。2. 派系對口：這時的國會尚未建立今日我們所熟知的黨團機制。換言之，國民黨中央就重大的政府人事、政策，做出提名、決議的前後，經常也必須仰賴總裁蔣介石糾集院內派系領導人做為商談對

⁵⁰ 社論，〈如何整頓公營事業〉，《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5月11日，版2。

⁵¹ 「陳果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5月11日），〈金融（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9-00005-003。

⁵² 陳果夫，「重建金融計畫大綱草案」（1950年5月11日），〈金融（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9-00005-003。

口，亦即透過政治強人的分線領導而求取共同貫徹。3. 由於宗派主義、民主是競，或厭黨反蔣的思維籠罩，黨籍立委經常援引憲法賦予的制衡權責做為問政句戟，導致行政、立法兩院關係並未因為國民黨在體制內的獨大優勢而呈現穩定。基本上，這些特徵在國府遷臺初期，一時尚未消失。

1950年2月1日，立法院在臺北中山堂辦理第五會期報到，新的議場與會期不僅重新喚起了一批國民黨渡臺菁英的政治活動熱情，驗諸來茲，卻也全面喚醒了國會宗派主義的幽靈。主要的立院次團都舉行了聚會，體現了各派系成員視立院新會期為展示問政影響力的絕佳機會。⁵³ 在CC這邊，4日，陳立夫約請20餘名立委赴草山李翼中寓所（心水齋）共進晚餐。飯後，宣洩幾年以來自認受到的委屈，認為經常代人承擔黨內過錯，也澄清自己並未像同志所誤解的失之消極云云。當場，陳立夫宣示了令其僚友同感振奮（卻又懷疑是否只是五分鐘熱度）的新態度：與其遭受不諒，動輒得咎，今後不如重新積極活動，第一步先求團結自己的同志們。⁵⁴ 當晚，陳立夫又再澄清油輪公司接收風波、省府人事薦舉耳語，也一再抱怨有人乘隙挑撥他與陳誠的關係，表示兩人曾共同約定互不毀謗、不聽閒言，最近還要找陳誠解釋明白。⁵⁵ 但事實是，隨著蔣介石打算喚回自己在政府體制內的合法支配角色，於3月1日復行總統職權，陳立夫、CC與陳誠的緊張關係立刻又反映在新任行政院長提名風波當中。⁵⁶

一、陳誠閣揆提名案風波及其妥協

1948年，在初試憲政啼聲的立法院裡，山頭林立，國民黨中央部勒乏力，見不到一個願意捍衛政府決策的「在朝」派別，行政院各項施政迭受抨擊。但1950年春，蔣介石有意提名陳誠擔任行政院長，預期至少可以獲得一批「黃復青」勢

⁵³ 「黃復青」勢力（前新政俱樂部）：趙自齊口述，遲景德、吳淑鳳訪問，吳淑鳳記錄整理，《趙自齊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113-116；中社：〈「中社」立法委員〉，《新聞天地》，第104期（香港，1950年2月11日），頁4。

⁵⁴ 《程天放日記》，1950年2月4日條，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參見邱星明，〈陳立夫躍躍欲試〉，《新聞天地》，第105期（香港，1950年2月18日），頁15。

⁵⁵ 邱星明，〈陳立夫躍躍欲試〉，頁15。

⁵⁶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416。

力（前新政俱樂部）立委的奧援。行憲兩年以來，這也是第一個能和國會某一主要派系產生連結的閣揆提名案，可望在國民黨一黨獨大卻又派系對立的內閉性結構下，聯合催生出某種意義的「執政派」。當然，一旦如此，則CC形同「在野」，自又不免考驗著陳立夫、陳誠自中國大陸時期「黨團之爭」以來「因之不能沒有一點芥蒂」的敏感關係。⁵⁷

其實黨內外對陳誠的提名案並非沒有雜音，惟CC反對之言行最不技術，最是觸怒了蔣介石與陳誠。3月4日，蔣介石召集兩場帶有疏通意味的談話會，先是聽到中央組織部長谷正鼎轉達黨籍立委要求假投票的願望，當場嚴斥，「事後半日鬱結，不能自解，甚以立法員至今還未有覺悟，仍如往年在南京無法無天，以致有今日亡國之悲劇，是誠死不回頭矣。」⁵⁸ 傍晚，再聞CC多名中常委以陳誠的直頑性格與軍人背景為理由而反對。陳誠記道：「有人反對是最好的事，尤其CC反對，對余個人並無絲毫損失，惟CC年來對於國家無事不阻礙，對於有為之同志無不反對，殊為可惜耳，真不知死之將至耶？」⁵⁹ 翌日，行政院政務委員徐永昌所見到的陳誠已是一派忿憤，甚至口出「其實制彼祇要兩警察可」，且「反復言之」，「對立夫大有不可終日之勢」。⁶⁰

3月6日，這場紛爭在蔣介石面對黨政官員、全體黨籍中央民代，難以收束情緒，而又採取恩威並濟的家父長式道德說教之下，獲得形式上的緩解。⁶¹ 然而追根究柢，實際上最關鍵的轉折因素，仍在於陳誠和陳立夫達成了新閣人事的妥協。先是陳誠獲得立院投票同意前，曾與蔣介石談及閣員人選，擬以蔣經國任內政部長，張其昀任教育部長，只是經國已獲蔣介石內定國防部總政治部職務，議遂寢。當時陳誠就已聽到CC立委對提名案「有以分贓式作為投同意票之條件

⁵⁷ 「一點芥蒂」，陳誠語。薛月順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440-441。

⁵⁸ 《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4日條。1948年，蔣介石原本屬意張羣擔任行憲首任行政院長，但遭CC黨籍立委要求假投票而試選出何應欽，釀成僵局。蔣指責CC幹部假借假投票「玩弄手段」，至於「立夫變態之快，殊為生平最大之教訓也。」參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228-231。

⁵⁹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3月4日條，頁743-744。

⁶⁰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3月5日條，頁30。

⁶¹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419-421。

者」，自謂：「此種風氣絕不可繼續存在，此種行為絕不能接受。」⁶² 6日，閣揆提名風波甫獲轉圜，蔣介石卻又自記「立夫對辭修組院有所要求」一句。⁶³ 所謂「要求」，仍是人事安排問題。

蔣介石是否下了人事妥協的指導棋，尚未得充分資料完全證明，但要說他完全置身事外，恐怕也非合理。3月8日，立法院就閣揆提名案進行投票，報紙已然登載行政院副院長以王世杰、張厲生、谷正綱3人呼聲最高。⁶⁴ 其實陳誠原已約請王世杰幫贊，獲允，然則這條消息的刊布時機、動機，足資耐人尋味（張厲生，親陳誠，但可與CC聯絡；谷正綱，CC）。⁶⁵ 傍晚，陳誠獲得立院投票通過後，立即往訪陳立夫，徵詢新閣人事意見。根據蕭錚的說法，這次會面迅即敲定余井塘、程天放2人分掌內政、教育部。⁶⁶ 9日，陳誠同蔣介石討論部會人選後，當即訪邀余、程等人入閣。⁶⁷ 幾天之內，黨政圈風傳陳誠「與立夫已有妥協，立夫必須佔二部也」，及至新閣名單曝光，又說陳誠「與西西密切合作矣」。⁶⁸ 至於行政院副院長一職，改由張厲生出線。事前，王世杰未能置一詞，又「總統未經渠同意而逼渠任總統府秘書長」，都令他至為不快。⁶⁹ 事後，谷正綱傳出消息，謂「辭修告少谷，陳立夫反對雪公任副院長。」⁷⁰

⁶²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3月3日條，頁742-743。續有CC人物自薦部長，表示可代為疏通立委，陳誠仍不為所動。3月5日條，頁744。

⁶³ 《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6日條。

⁶⁴ 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3月8日條，頁57。

⁶⁵ 陳誠已約王世杰。但蔣介石在張羣婉拒總統府秘書長職位後，改請王世杰擔任，王不願就，猶以協助陳誠為己願。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3月1日條，頁741；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2月26，3月6、9、11日條，頁49、56-57、59。

⁶⁶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38。

⁶⁷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3月9日條，頁747。

⁶⁸ 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3月11日條，頁59；「羅家倫日記」，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950年3月11日條，頁477。

⁶⁹ 王世杰面告雷震。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3月11日條，頁59。稍後陳誠才告訴王這項消息。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3月12日條，頁747。

⁷⁰ 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3月16日條，頁63。雪公，即王世杰，字雪艇。

16日，新舊教育部長交接。昨晚10時，程天放才跟陳立夫共商次長人選等問題；這天早上10時，他在交接式上特別說明「此次出長教部實非得已，以總裁之命不能不接受。」⁷¹程的致詞一方面是要跟分贓、妥協的耳語劃清界線，一方面似乎也說明了蔣介石在「立夫對辭修組院有所要求」之後，扮演了某種可堪玩味的中介角色。然而，這種妥協政治造就的兩院和諧，在立院第五會期剩餘的兩個半月內，證明只是暫時的表象。其中，尤以會期末的立法院長童冠賢請辭案、立院授權案風潮，掀起波瀾最鉅。

二、立法院長童冠賢請辭案：蔣說立夫「鬼崇至此」

1948年12月，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童冠賢受益於黨內倒蔣求和聲浪與派系政爭，擊敗中央提名人選，當選行憲第二任立法院長。任內，支持代總統李宗仁進行國共和談。⁷²1949年，和談破裂，轉赴香港，熱中第三勢力運動。10月7日，在粵北戰事緊繃聲中，請辭院長。⁷³翌日，廣州立法院舉行臨時秘密會議，決議在院長請辭案未經院會決定前，暫請副院長劉健羣（前復興社與三青團領導分子）代理院務。⁷⁴及至1950年2月，立法院在臺北辦理第五會期報到，院長改選問題正式浮上檯面，立委有躍躍欲試者，CC陣營甚至一度寄厚望於海外歸來的程天放，力促出馬。⁷⁵

各界預期的這場立院龍頭改選，容易讓高層聯想到行憲以來黨籍立委屢屢脫逸中央號令的經驗。2月3日中午，蔣介石在草山的一場餐敘中，就已提醒陳立夫「不談院長選舉，以免引起糾紛，貽笑人民及外國」，傾向繼續承認劉健羣代理的現狀。⁷⁶其實就算是蔣介石復職總統後，還都希望能在立法院內籌設黨團，利便

⁷¹ 《程天放日記》，1950年3月15-16日條。參見《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3月17日，版1。

⁷²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381-383。

⁷³ 〈童冠賢提請辭去院長職〉，《中央日報》，臺北，1949年10月8日，版1。

⁷⁴ 〈立院討論當前局勢〉，《中央日報》，臺北，1949年10月9日，版2。

⁷⁵ 《程天放日記》，1950年2月16日條。參見「羅家倫日記」，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1950年2月1日條，頁473；〈程氏否認競選立法院長〉，《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2月2日，版1；〈江一平有意競選立法院長〉，《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2月7日，版1。

⁷⁶ 蔣介石設宴，替搭機抵臺兩天的中央宣傳部長程天放、前駐印度大使羅家倫洗塵，陳立

申明黨令黨紀以求繩墨，但卻格於立委的不同意見而一時未果，依然只能透過派系對口，或由總裁親自召集全體黨籍立委講話，求取上意下達（套句陳果夫的話說，即「僅憑歷史關係與道義情感為維繫之資」）。⁷⁷ 也因此，在國民黨政權遷臺初期風雨飄搖、對國會黨員控制尚非如臂使指的情勢下，蔣介石開始思考以最小的代價解決本次院長改選問題。

整個春天，國民黨中央秉持蔣介石的意思，限期指令黨政滯外人員赴臺。不過，指令為其表，清理疏離分子才是實。5月15日，蔣介石在一般會談中，要求立法院盡快同意童冠賢請辭，並推舉劉健羣依法代理。⁷⁸ 理由是，擔心童冠賢可能在海外任何一個時間點糾集一批未到臺的立委召開院會，以致衝擊國會法統與國際觀瞻。包括陳立夫等CC勢力在內，並非每一位幹部都和蔣懷有同樣的憂慮，但這樣一來，他們倒是覺得這名領導人對於國會掌舵新人選已有定見，甚至要藉此提供陳誠施政奧援了。從國會生態與陳誠內閣的對位關係看來，CC已與在野派無異，尤其不能無視。

事實上，立法院第五會期已近尾聲了。在5月29日的一般會談中，陳立夫、谷正綱等人就強調，如果准童辭職，則大家就該立刻推選一位新的立法院長（而非再代理），不過屆時恐怕又要激化院內的紊亂局面，因此主張擱置童案。對此，蔣介石解讀「立夫等組織部立法員」純粹是出於排斥劉健羣之「縱敵制友」心理，自喟「幹部自私心理如不打破，則國亡無日矣。」因而當場要求諸人改正作風，堅持「會期內解決」童案。⁷⁹ 30日，黨營中央喉舌配合發表社論，品評立法院第五會期得失，指責立法權仍是行憲以來的老毛病，亦即未能秉持國會多數黨優勢而有效的聯繫起行政權；又「詫異」於立院「院長問題遷延不決」，「請問

夫、黃少谷、張其昀夫婦、曹聖芬作陪。《程天放日記》，1950年2月3日條。

⁷⁷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13日條；「陳果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23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1-062。

⁷⁸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15日條；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5月15日條，頁765-766。

⁷⁹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29日條。參見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950年5月29日條，頁339；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358。

立委諸公又將何以力求補救」。⁸⁰

這天，離立法院休會只剩一天多了。經由蔣介石的催使，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陳誠、陳立夫聯名宴請立委疏通，席間又遭CC力抗，陳博生率先發言反對劉健羣代理，邵華、江一平等要求維持現狀，一時引領了發言走向，以致「全場傾動，其勢遂不可挽。」然而動見觀瞻的陳立夫始終未發一語，不免給人「採取消極態度」的聯想。事後，連孫祿卿都將立夫的沉默，視為一種「不聰明」的舉動。又，根據立夫的解釋，這是因為自己還來不及說話，就聽到「辭修先生繼之補充數語後，以會場情緒有欠寧貼，即匆匆作結論謂：『有一同志主張從長計議。很好。我們大家可以回去研究。』與會者即紛紛起立，聲言『回去研究』。」⁸¹ 姑不論曲直，顯然陳院長動了氣。

午宴結束，王世杰3人前往蔣介石新遷入的士林官邸，請示是否還要進行疏通工作，繼續貫徹准童辭職的主張。蔣「至此心碎，不復作言」，拋下一句「從此了結，不再與問黨事，大家等候共匪受俘一一待斬可也」，隨即上樓。⁸² 下午，3人再會商，終因陳立夫表示沒有把握通過童案，決定放棄。晚間，蔣介石透過機要秘書周宏濤呈報，得知3人結論，又有情緒。⁸³ 日記直指「國民黨再不可救藥矣」，並歸咎立夫「陽奉陰違」、「不識大體，鬼崇至此」，自恨：「焉得而不敗亡耶」。又恨「自我用人不明，貽誤黨國，罪莫大也。」⁸⁴ 翌日，再聞CC又擋下立院授權案，至是再難假貸。

⁸⁰ 社論，〈立法院第五會期的得失〉，《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5月30日，版2。

⁸¹ 「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8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1-005。參見《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0日條；《陶希聖日記》，上冊，1950年5月30日條，頁340。「消極」聯想，王世杰語。見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6月2日條，頁119。「不聰明」：《程天放日記》，1950年6月25日條。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周宏濤在根據自己日記所編寫的晚年回憶錄中，突出了自己穿梭促成當天餐會的角色作用。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59-360。

⁸²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0日條。參見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0。

⁸³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0。

⁸⁴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0日條。

三、立法院授權案風潮：陳誠「要和他們拚」

陳誠執掌行政院，權能集中化的企圖心頗強，又以「軍事與確保臺灣」做為院務重點，有「徒法不足以自行」，宜「急其所急」之想，不免和其他政府部門時見扞格，甚至包括了憲法明訂的負責對象：立法院。⁸⁵ 不過，即使連陳誠自己，對於行憲後的政治制度究竟算不算是內閣制，也缺乏堅定的認知，當然影響了他看待立法院的角度；⁸⁶ 至於立法院內，與行政院的權責對位關係究竟該如何確定，包括立委提案權之範圍為何，更是一再引發爭辯的議題。⁸⁷ 看來，這一類憲政體制所帶來的人言言殊，和戡亂使命互為揉雜而產生的部門權界之爭，又因為宗派主義的浸染而顯得治絲益棼了。其衝擊政局之鉅者，首推立院第五會期休會前掀起的授權案風波。

先是國府疏遷廣州時，立法院曾應行政院請求，決議於休會期間，授予行政院變更現行法令、將須經立法程序之事項逕付執行的權力，俟立院復會後提請追認，意在增強閣揆權，迅赴事機，兼收制衡代總統李宗仁之效。⁸⁸ 及至陳誠就任行政院長後，鑒於軍政經濟情勢緊張，也想援引前例，要求立院同意釋權，強化政務效能。但在蔣介石主持的內部會談中，陳立夫表示總統既已復職，行政院長仍以恪守範圍為宜。⁸⁹

⁸⁵ 國府遷臺初期，人稱風雨飄搖之際，陳誠自記「徒法不足以自行」。2月，研究蔣介石復職的程序問題，又記：「應採革命行動，根本不能照憲法做，最低限先行復職。」5月，指示院務重點所在，表示當前教育經費欲符合憲法所訂比例係「絕不可能，亦不必要」，指CC系立委以「違法」相控者「未識乎？搗亂乎？」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1月9日、2月5日、5月10、12日條，頁716、727、764-765。

⁸⁶ 薛月順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冊，頁113。

⁸⁷ 溢權，〈論行政立法二權之關係〉，《臺灣新生報》，臺北，1950年4月6日，版10；《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十六次會議速記錄》（1950年4月18日），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藏；〈政立兩院關係〉，《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4月19日，版1；《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十七次會議速記錄》（1950年4月21日）；〈定期開談話會檢討提案權範圍〉，《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4月22日，版1；〈立法院今開談話會〉，《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4月26日，版1。

⁸⁸ 詳見兩次院會的討論與表決過程：《第一屆立法院第三會期第二十三次會議速記錄》（1949年5月27日），頁67-95；《第一屆立法院第三會期第二十四次會議速記錄》（1949年5月31日），頁8-24。

⁸⁹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424-425。

5月31日，立法院舉行第五會期最後一次院會，也是該會期的休會日。前一天，CC分子才成功凍結了院長請辭案的進一步處理，卻也再度挑弄了他們和高層決策者原即缺乏共信的脆弱關係。當日上午，立委張慶楨等131人突然提出臨時動議，擬請立院同意休會期間授予政院全權，惟發言反對者又是CC，咸以今昔時空有別、臨時條款已可應付緊急重大事件為詞，悉以堅守國會制衡功能、建立法治基礎為尚。就在會場紛請發言，導致秩序失控之際，主席劉健羣裁決停止討論，提付表決。值得注意的是，劉要求「主張本案保留者」先舉手，不失技巧的讓會場洶動的反對者全數曝陳了立場。最後，反授權者以57%的多數贏得勝利，院會決議「本案保留」。⁹⁰

表決消息從中山堂傳到300公尺外的介壽館。目前坊間可見的時人日記刊本、憶述文獻，雖常描述陳誠在館內主持行政院會半途聞訊後的激烈反應，可惜多是二手聽聞；⁹¹ 至於當天陳誠日記刊本也只留下「因立法院持有成見之委員（CC）反對授權，向總統提出辭職」一語，略只顯示了這位閣揆是將宗派主義作梗，視為政務受挫的關節所在。⁹² 對比之下，教育部長程天放所記行政院會現場的一手見聞最是生動可觀（無可諱言的，他的派系本位視角當然也躍然紙上）。根據程的日記，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將秘書處職員傳入場內的紙條遞給陳誠，陳閱後立刻宣布立院表決消息，難掩情緒：

「革命的都不能講法。我們要和他們拚，明天開始要拘捕十個人送出境。」並特別指邵華、谷正鼎在大陸上就反革命，「現在依然反革命」。說後，以拳擊桌，聲色俱厲，並謂：「我一個多月來即準備不幹，立夫係多數黨領袖，應請其來做院長。」……說國民黨人「絕對無藥可救」，「行政院要負責任，因此要做行政院長者預留之地步。將來在休會期間，行政院有必要控置，立法院可說行政院違法，改組行政院。因此如總統有決心革命，則可幹，否則不幹。我趁一二個月解決他

⁹⁰ 《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二十八次會議速記錄》（1950年5月31日），頁10-26。

⁹¹ 例如：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6月1-2日條，頁118-119；謝幼田整理，《居正日記書信未刊稿》，第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950年6月3日條，頁155；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6月15日條，頁65；陳立夫，《成敗之鑑》，頁382；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39。

⁹²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1950年5月31日條，頁766。

們。」⁹³

言次，黃少谷曾報告立法院討論過程，有人認為是立委自行提出授權案的，實則行政院並無請求云云，司法行政部長林彬遂建議以政院名義去信復請立院通過，然陳誠表示「不必理他們」。據程天放說，眾人見「辭修神經太緊張」，乃勸離會場休息，改請副院長張厲生主持議事（程的記述足以澄清有關陳誠忿而暴走離席的傳聞）。院會結束後，各員前往院長辦公室探視，陳已趨平靜，但「餘怒未息」。晚間，程天放赴陳立夫浦城街寓所，「將辭修對渠之誤會告之，立夫甚憤恚。」雖然程主張「不必有所表示，候時日稍久，真相自白」，但實情是，授權案成了壓垮立夫的最後一根稻草。⁹⁴

伍、蔣介石決定以陳立夫為祭旗

國府遷臺之初，蔣介石和陳立夫的政治依存關係之升降，主要取決於兩點：一在於陳立夫能否繼續動員其政治基礎，有力挹注（而非悖反）蔣的統治地位及其心目中的黨國統治秩序。就這點而言，行憲以來，已讓蔣信心日跌；數月以來，更是每下愈況。另一在於，蔣介石產生了以陳立夫之去留做為展示改革決心以利爭取美國輿論乃至美援的思考。有關這點，數月以來，則視國際冷戰形勢與美國對臺政策之變化，始終存乎蔣的一心。

1949年底，蔣介石應美方之請，進行部分人事更張，然去陳尚未成局，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1950年開年聲明不以軍隊、軍援或顧問干預臺海局勢，曾讓國府至感失望，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⁹⁵及至春夏，由於共黨中國與蘇聯的條約結盟，以及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席捲，導致美國國務院對國府的「袖手政策」備受美人抨擊，也激化了杜魯門政府內部意見的矛盾。例如5月30日，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 Rusk）寫給國務卿艾

⁹³ 《程天放日記》，1950年5月31日條。標點符號由本文作者自加。

⁹⁴ 《程天放日記》，1950年5月31日條。

⁹⁵ 薛月順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冊，頁90。

奇遜（Dean G. Acheson）的備忘錄中，就直指美國已經面臨全新的關鍵時期，必須阻止臺灣落入共黨之手（當然，他的意見是以實現「臺海中立化」、促蔣交出權力為基礎，這肯定不會讓蔣高興）。⁹⁶ 至於艾奇遜自己的立場，儘管還未到結構性翻轉「昨日之我」的程度，畢竟也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⁹⁷ 在臺灣，蔣介石則是審慎看待這股「轉變之傾向」，自記「吾願國人永不受人之援而受今日之奇辱慘禍也」。⁹⁸ 我們試著從蔣的主觀期許和客觀環境的辯證關係重新思索這句話，多少當然也能察覺，蔣在「辱」與「禍」的現實磨折下，雖常有自力更生的想，說到底，猶是懸懸而望，還有著「受人之援」的期待與需要。

5月中、下旬，授權案發前，蔣介石仍然傾心於討論了幾個月的組黨計畫，但是顧慮到軍事形勢外張、黨務改造藍圖多有雜音等因素，全然少了立即實施的決心。⁹⁹ 然而31日案發，蔣的態度完全翻轉，自此不再徘徊瞻顧，而有獨斷獨行之念。這一天，陳誠方面首先做出反應，顯露了不願再要「牛驥同一皂」的意思，等於要求蔣給予最後的裁決。例如蕭贊育，一位黃復青勢力的要角，雖然也和陳果夫等CC人物具有交情淵源，惟授權案發，馬上就向蔣介石請辭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位，謂「參加工作，固所欣願，不意遲遲迄今，黨迄無新生希望，誠非始料所及」，「今後如有澈底改造，從新做起之日，自當惟鈞座之命是從。」¹⁰⁰ 陳誠也提辭職書給蔣，這已經是他一個月來第二次表達倦勤之意了，而語調之激越更甚。函呈強調行政院各項措施未得「立法院一部分持有成見之立法委員」諒解，動輒得咎，「非任何人所能堪」，不得不辭職「以讓賢路」。至於繼任人選，自以領導立委「多數」之「陳立夫先生為妥」。¹⁰¹

⁹⁶ “Extract from a Draft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30,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349-351.

⁹⁷ 詳見國際關係史學者的討論。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351；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56。

⁹⁸ 《蔣介石日記》，本月反省錄（3月）、1950年4月10日條。

⁹⁹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18日條、上星期反省錄（5月20日後）。

¹⁰⁰ 「蕭贊育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5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1-013。

¹⁰¹ 〈簽呈請辭行政院長職務〉（1950年5月31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

不到一個星期前，蔣介石二度交議的中央海外部副部長人事案，才在中常會上受挫未能通過，而童冠賢案、立院授權案又起波瀾。如同兩年前起步的憲政經驗所示，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的不同意見、制衡行為，既可形成一般意義下的兩院之爭，也容易上升為國會與總統權力意志（也是黨籍立委與總裁）之間的扞格。¹⁰² 此刻，蔣介石完全認同陳誠所謂宗派主義失控而阻礙施政的觀點。31日日記、反省錄批評立委「蠻橫無道」、「自私忘國」，「是其反動侮黨之惡習再難滌除，可說無法救藥」；¹⁰³ 對陳立夫與CC則似已再難容忍，決意「整肅」以圖存，兼收徹底改造、對美宣傳之祭旗作用：

立夫CC派對時局危亡之嚴重性，至今不僅毫無覺悟，且仍以過去大陸搗亂助共自殺之作風，專以個人之權利爭奪是務。此風若不能澈底改革，則政治決難安定，政府無法行使保衛臺灣反共抗俄之職責。與其因循而亡，則不如革命不成而亡。何況此時如能處置得宜，對外宣傳有效，則美國務院反動派不能以專制獨裁法西斯復活為辭而藉機斷絕對華關係也。而且即使其斷絕關係，此時尚有半年自立之道（經濟）。決以革命獨立奮鬥方針，不顧一切，先肅清內部、澄清政治、穩定基礎為惟一救亡之道，即使冒險亦應斷行，此我死中求生之機也。¹⁰⁴

蔣介石「冒險斷行」的念頭，僅在一個星期內，透過小圈子的意見交換，就已束紮成具體的框架了。應「行」之事，指的就是改造。6月1日，蔣介石找了黃少谷（也是前總裁辦公室秘書主任）談「澈底改革方針」；¹⁰⁵ 2日，向蔣經國談「改造本黨與整肅反動之決心」。¹⁰⁶ 不令人意外的，黃少谷成了介壽館府院兩位首長的搭橋人，不只接受蔣介石的託請，退還了陳誠的辭呈，肯定也傳達了最高領導人最新的整肅意向。¹⁰⁷ 5日，陳誠上呈意見書給蔣，將「制裁黨的派系

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745-746。

¹⁰² 王良卿，〈蔣介石和1958年出版法修正案的審議風潮〉，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下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頁675。

¹⁰³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1日條、5月反省錄。

¹⁰⁴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1日條。

¹⁰⁵ 秦孝儀總編纂，李雲漢、呂芳上、劉維開、邵銘煌編輯小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9（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1950年6月1日繫事，頁169。

¹⁰⁶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9，1950年6月2日繫事，頁169。

¹⁰⁷ 「1950年大事表」，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頁711。

之傾軋」視為黨務改造的要旨與急圖，並指名中常委陳立夫、組織部長谷正鼎、中監會常委邵華3人阻撓童案與授權案，建議總裁手令停止或褫奪黨職，並指定地點，令陳、谷2人閉戶反省；關於改造問題則建議變更原定程序，改由蔣採取「革命手段」，直接宣布方案、宣言、改造籌備委員名單，不再透過中常會和五中全會背書，並即停止第六屆中央委員職權。¹⁰⁸

整體而言，日後蔣介石要求陳立夫離臺、以總裁特權主導黨務改造、壓抑CC等，都和這一件意見書所勾勒的方向相去不遠。某種角度而言，他的「冒險斷行」、「整肅反動」心理是讓陳誠的具體意見給強化了。6月6日，邀黃少谷商談改造問題，即考慮不再循五中全會此一法理程序處理，主張「應以余之主動提出，絕不受任何派系之牽制。」¹⁰⁹ 9日，日記再度表露伸張總裁特權，藉以「整肅幹部、重建中央、樹立黨紀」的想法。又，從他表露的「此時救國必先改黨，急不容緩」等思路看來，蔣再動念的改造，未必是日後看到韓戰爆發，才願意排上期程的順風車產物。¹¹⁰

同在6月上旬，黨政報紙連發社論，紙彈所及，儼然針對宗派主義的總攻，也等於是再啟動改造的檄文。值得觀察的是，《中央日報》5日內連登2社論，指斥黨內「分化、隔離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毒素」已結合了宗派主義，不僅一再遷延改造進程，更「非至斷送自由中國便無止境」；¹¹¹ 又慨歎國民黨「組織渙散、紀綱廢弛，是公知的事實」，並以未指名的方式要求黨員信守政綱政策、服從組織紀律，否則「只有不要他參加」。¹¹² 親陳誠的《臺灣新生報》也以未指名，卻更直白的口吻責難「極少數幹部」的「操縱把持」、「喪心病狂」，「把國家和黨鬧得如此田地，果誰之過歟？果誰之過歟？」又疾呼黨務改造事急勢迫，然而「尚無動靜，不知是何道理。」¹¹³

¹⁰⁸ 陳誠，〈簽呈處分違命亂紀及黨政改造兩問題〉（1950年6月5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746-748。

¹⁰⁹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6日條。

¹¹⁰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9日條。

¹¹¹ 社論，〈為黨的改造而呼籲〉，《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6月3日，版2。

¹¹² 社論，〈黨的改造的一個問題〉，《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6月7日，版2。

¹¹³ 社論，〈趕快實行黨的改造〉，《臺灣新生報》，臺北，1950年6月3日，版3。

蔣介石自有若干「動靜」。6月13日，再約黃少谷商討「組黨」等問題，顯示先前訴求「毀黨造黨」的甲案仍在優先考慮之列。¹¹⁴ 日來，陳誠方面對於黨內整肅的勢頭瞭然於心，透過其言論陣地所祭出的持續攻勢，與其說是喚起世論，毋寧說是面向層峰決心的再對話、再促請確認。15日，《臺灣新生報》再發表社論，托借某「友邦」因素，等於還是劍指CC。文章聲稱「過去，友邦希望我們改革，而我們終於改不了，革不成」，又指出中國的政治以人的結合為基礎，「人情」二字正是改革的最大敵人，再不能憐惜怯懦，必須求毀求成，只有毀去壞的、舊的，才能創造好的、新的：

毀吧！澈底的毀吧！全盤的毀吧！應該破除的思想，必須馬上破除，應該取消的組織，必須馬上取消，應該淘汰的人物，必須馬上淘汰。……絕對不能心軟膽怯。總統與陳院長都是剛性人物，而且又皆以天下國家為重，所以他們的勇敢與決心是沒有問題的，尚望負責執行的幹部，硬起心腸，扯破情面，為國家為人民而盡其最大努力。¹¹⁵

陸、陳立夫見摒於權力圈外

授權案表決結果傳抵行政院院會，「剛性人物」陳誠意氣難平，首揭驅逐10人出境之說，也請求蔣介石指定地點，命令陳立夫、谷正鼎「閉戶反省」，等同軟禁，又促蔣逮捕、褫職、監視、注意之其他相關人士。¹¹⁶ 6月上旬開始，政壇哄傳陳誠、陳立夫決裂消息，甫就任聯勤總司令的黃鎮球以「派系之爭，文東武東之鬥」一句坐觀，「看他們在棺材裡，能鬥出什麼把戲權利來」，略能表示局外者之一二態度。¹¹⁷ 軍政圈散播著各種傳言，諸如陳誠擬就了一份陳立夫為首，谷正鼎、邵華以降21人的黑名單，預備送往火燒島云云。特別是一些CC要員也

¹¹⁴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13日條。

¹¹⁵ 社論，〈我們在實行改革了〉，《臺灣新生報》，臺北，1950年6月15日，版3。

¹¹⁶ 陳誠，〈簽呈處分違命亂紀及黨政改造兩問題〉（1950年6月5日），頁747。

¹¹⁷ 文東，指陳立夫；武東，指陳誠。《黃鎮球日記》，1950年6月11日條。參見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6月1-2日條，頁118-119；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0冊，1950年6月15日條，頁65。

從親陳誠勢力那裡聽到類似消息，半信猶疑。其實陳誠的忿言只是一時，傳言從未成真，然當時捲入政治漩渦如CC者，萬種恓惶，不可終日。¹¹⁸

值得一提的是，6月7日，行政院舉行院會，也是陳誠以「防疫注射不適」為理由，改在寓所辦公一週後，回到行政院的首日。¹¹⁹院會通過陳誠提議，任命李樸生為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透過臨時討論，通過「調整國營事業機構方案」。該案檢討26個國營事業機構，其中CC掌控的國家金融行庫首當其衝：一、裁撤中國農民銀行，但「暫予保留名義、留置三數人保管財產」直到「收復大陸」再議；二、中央合作金庫業務與臺省合庫重疊，人員多未來臺，決議裁撤，財產併入農行保管。¹²⁰

授權風波發生，陳立夫是以「辭修先生在院會席上、友黨之前，破口大罵」來理解自己的艱難處境，曾專程訪晤、專函解釋，「乃至再至三不蒙約見」，才了解「彼之不慊」甚深。又曾尋求黨政幹部居間緩頰，也沒有收到太多的效果。¹²¹其實，陳立夫明白蔣介石也有情緒。6月初，他已被排除在例行的一般會談之外了，也曾兩度求見蔣，未果。¹²²6日，應中國工程師學會臺灣分會邀請演講，對於中山遺教又是一番敷陳。這是未來兩個月內，他的唯一公開行程了。7日，在《中央日報》刊載的演講全文旁邊，正是那篇「只有不要他參加」的社論。¹²³

6月8日晚上，陳立夫前往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周宏濤寓所說明童冠賢案，表示只以感情領導立委，非能如臂使指，又抱怨起蔣介石的兩面控制手法。長談最

¹¹⁸ 《程天放日記》，1950年8月4日條。

¹¹⁹ 〈陳揆微恙 業已康復〉，《臺灣新生報》，臺北，1950年6月8日，版2。

¹²⁰ 「行政院第一三五次會議」（1950年6月7日），〈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5冊〉，《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14-000205-0032。

¹²¹ 引號文字出自「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8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1-005。參見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6月1日條，頁118。

¹²²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1。關於陳立夫被排除一般會談之外，並見《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日條。

¹²³ 〈今日中國工程師之地位與責任〉，《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6月7日，版2。

後，托請周轉呈一封解釋信。¹²⁴ 函中自感「惶罪之餘」，仍要向蔣申述「立委大多數同志」主張保留童冠賢與授權兩案的理由，尤其着重說明上月底王世杰3人聯合邀宴的立委發言過程，以及立法院會處理授權案臨時動議的始末。¹²⁵ 函末，陳立夫認為先前協助陳誠組閣的苦勞，並未真正獲得人們的承認，反招「疑謗之來」。他告訴蔣，如果自己成了政治的障礙，自當知所進退，閉門思過：

職無狀。自政府遷臺，鈞座復任以後，時切戒慎恐懼之心，每圖群策群力之效。當鈞座甄選閣揆屬意辭修先生，職即百端贊助力促其成，並為化除褊見同赴大公起見，極言團結合作反共救國之旨，以期消泯黨內同志與黨外人士夙昔之錯覺與憂疑。當時談話曾揭報端，其披肝瀝膽之苦心，昨死今生之熱望，想蒙睿鑒，斷不致兩月之間前後矛盾驟變初衷一至於此也。願以樹德不厚精誠未昭，疑謗之來常有非意料所及者，因之事無鉅細，凡有乖迕，輒被指摘。職一介書生，遭受謗毀原無足重輕，但當此國運艱屯存亡絕續之秋，寧敢以一身為政治之梗而重增鈞座宵旰之憂。思維再四，惟有息影家居閉門思過，藉減愆尤。¹²⁶

其實蔣介石自從上月交議海外部人事二度受阻後，整整兩個月，未肯出席中央常會。他既煩悶於連番的黨政爭端，對陳立夫尤其不快，正是「政治之梗」重增「宵旰之憂」的如實反映。其間，曾於6月9日交下中央銀行改組理監事名單，其監事部分，劃掉了陳立夫的名字，代以陳果夫；但也在同一天的臺中，陳果夫接待蔣經國，才知道來客有意接管農教電影公司，顯然臺北權力中心對於黨國資本事業的相關非議也有一番定見。¹²⁷ 15日（即《臺灣新生報》社論籲請「澈底的毀」當日），蔣介石南下澎湖、高雄6天，視察兵力，聊遣悲懷。同一天，臺北舉行的一場中常委談話會則是目睹整個政權的內耗與日俱增，懷疑蔣介石似乎消極不問黨事，覺得「黨的中央對當前各種重大問題缺乏一整個而有力的正確領導」，遂在一批CC系委員力倡「黨權高於一切」、「五中全會非開不可」的推

¹²⁴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1。

¹²⁵ 「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8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典藏號：002-080200-00621-005。

¹²⁶ 「陳立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8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典藏號：002-080200-00621-005。

¹²⁷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2。

波助瀾下，推定居正、于右任、鄒魯等3元老求見總裁，詳陳意見。¹²⁸ 不過，蔣介石先找來的，反倒是黃少谷、中央秘書長鄭彥棻。

在高雄，3人利用兩天的時間討論延宕已久的黨務改造案，蔣介石仍要貫徹個人意志，自謂「其改造理由非用革命方法不能有黨章正當法律可以依據也」，顯然還是不願召開五中。¹²⁹ 22日，中常會在一片疑惑、憂慮、失望的氣氛下，再請3元老向總裁陳請「積極繼續黨的領導」、「示期召開五中全會」、「指示有關改造案問題」、「加強中央常會之領導作用」。¹³⁰ 不過，蔣找來的，還是鄭彥棻。他聽取了常會的發言梗概，自記：「一部分幹部恐余用革命方式取消其中委地位，發生疑懼怨望也。」¹³¹

另一方面，陳立夫遞給蔣介石解釋信後，就束裝準備南下，暫避政治漩渦。6月12日，抵達陳果夫的臺中寓所暫住。兄弟相見，談的仍是臺北的紛爭。越二日，陳果夫透過張厲生管道得知，陳誠認為CC有挾農民銀行、中央合庫與農教公司以為政治資本之嫌，又懷不平。23日，托請張道藩轉致12頁長函給蔣介石，說明黨營、國營事業已成眾矢之的，導致紛擾之象越來越顯著，再次請求辭卸中央財委會主任委員名義，至於農行、中央合庫的職務當然「亦可告一段落」，惟也努力以忠耿廉潔自清，以黨內「是非倒置，功罪難分」、「傾陷之風日漸養成」為辱。他也替弟弟辯護，既不解於授權案在蔣「復職秉政」後仍要提出的合理性，又提醒授權範圍跟從前不同，對於陳誠的施政能力、乃至「寬容忍耐」之缺缺，則是迭有煩言。又說：

立夫為此事，因聞辭修同志發生誤會，在院會席上友黨之前大罵立夫，因此數次往謁，復去信解釋，竟不得理會，意氣成見可謂盛矣。揆諸事理，立夫本非負此事全責之人，且前時竭力助辭修同志組閣，為時不過兩月，於立委同志間又何能領導一反至此。果認為所貴為同志者應重道

¹²⁸ 〈中央常務委員談話會要點〉（1950年6月15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6.41/90。

¹²⁹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18-19日條。

¹³⁰ 〈中央第二三五次常會各委員意見摘要〉（1950年6月22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6.41/98。

¹³¹ 《蔣介石日記》，1950年6月24日條。

義，應有互信，今不但無道義與互信可言，即普通為朋友交往亦不可得，實足令人寒心。¹³²

和陳誠的指控一樣，陳果夫也把事情歸咎於宗派主義所帶來的人事成見，只不過責任易位而已。果夫說自己20多年來，從未見過弟弟如此的鬱抑苦悶，至於他們「網羅識拔」的中央民意代表，對於蔣介石和黨的指揮「雖未能盡如人意，而忠貞不二，則甚少例外」，尤其需要蔣的「提撕教誨」。末稱：「總之，民主要有民主之風度，團結要有團結之誠意，人人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個人權利為輕，處理事務尤宜顧及制度，勿因人廢事，則國家復興有望。若不用理智，僅本感情行事，則前途將不堪言。」¹³³

陳果夫的「提撕」之請，或許正是看到立委陳博生的遭遇而有感觸。先前，陳博生反對劉健羣代理立法院長的立場鮮明，遭蔣介石點評為「少數擁童派」；¹³⁴緊接著，陳博生主持的中央通訊社新聞遭高層指控「洩漏軍事機密」，導致總編輯職位見奪。CC諸友將前後諸事連繫看待，只能設宴慰藉，共澆塊壘。¹³⁵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日記在6月25日前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寫有「改造黨的步驟」：「甲、約見老者。乙、約見預定之改造委員。丙、約見反對改造之中委。丁、約見立夫，警告其應自立自強與改革習性。」¹³⁶這段文字可能寫於當天韓戰爆發之前，如是，益可證明黨政現狀之蝸蟻，逼使蔣重啟改造進程，再無反顧；如果寫於韓戰爆發以後，則可說明臺海形勢匯入國際冷戰架構後，國府暫獲喘息空間，美援可期，蔣再無顧慮，得以放手做去。無論如何，所謂責以立夫「自立自強」，可確定是一種配合改造期程的舉動，或許也已朝著某種流放的角度思考。

¹³² 「陳果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23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1-062。

¹³³ 「陳果夫致蔣中正函呈」（1950年6月23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典藏號：002-080200-00621-062。

¹³⁴ 《蔣介石日記》，1950年5月30日條。

¹³⁵ 《程天放日記》，1950年6月26日條。

¹³⁶ 《蔣介石日記》，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1950年6月25日前）。

另一方面，韓戰「救了國民黨」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外部邏輯淡了，甲案「毀黨造黨」的設想似乎也少了急迫實現的需要。6月底至7月上旬之間，蔣介石及其幕僚大致底定了改造計畫。根據幕僚群寫成的一份備忘錄「關於本黨改造的幾點建議」看來，新的辦法已較甲案「溫和保守」，實係脫胎自乙案停止中委職權以利重整的路線。稍異之處，則在提供總裁更多「斷然決策」的權力，例如：改造案將逕交停權前的中央常會通過，象徵黨內民主程序的五中全會將不會舉行，改造委員人選則由總裁全權遴選。幕僚群顧慮到五中停開一事必將遭受「穩重份子堅強而激烈之反對」，因此也建議蔣約請若干骨幹分子幫忙「疏導說服」。在他們擬訂的改造委員參考名單中，「已避免黨內某一派系之色彩過於濃厚」，意指CC，也顯然是蔣交代過了。¹³⁷

「幾點建議」也透露了陳誠的最新態度。基本上，新案設想的程序，符合陳誠在授權案後請求總裁「採取革命手段」的基本意向。但是到這時候，他已翻轉立場，反而覺得停止中委職權，費力大而收效少，不如改組中央黨部，特別是更換中央組織部及財務委員會負責人（谷正鼎、陳果夫），即可令人耳目一新，不致牽動全局。這至少說明了：1. 在改造將要啟動前，陳誠可能回到了素來不喜歡總裁／總統權力膨脹而至侵越有司的老立場，彷彿連他自己也該被「疏導說服」了。2. 經過一個月的情緒沉澱，陳誠已願意將年來黨政糾紛的責任歸屬給予範圍化。除了將被科以重懲的陳立夫，和其他幾個人之外，少了株連，正可着手修補和CC陣營的關係。

柒、蔣介石請陳立夫赴美擴增器量

7月中旬，經由中央秘書處動員，在臺8成比例的中央委員連署了一份敦請總裁蔣介石「斷然決策，改造本黨」的文件。形式上，這是中委願意自廢權力的政治宣稱。¹³⁸ 也在這時，陳立夫迎來了與陳誠的形式化和解，卻也接到了蔣介石要

¹³⁷ 詳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444-445。

¹³⁸ 〈吳敬恆等二一五人聯名呈請總裁斷然決策改造本黨案〉（1950年7月），《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6.3/242.19。

求離開臺灣的指令，兩事互為關聯。就前者而言，一些官場人士眼見陳誠、陳立夫的冷戰積久，不無居中彌縫、調停之意，而比起月前，這些動作已能得到陳誠的點滴回應。例如在臺北介壽館內，資政吳忠信表示願作魯仲連，雖未得蔣之可否，仍告訴陳誠：「你們兩人，你也打不倒他，他也打不倒你。」內政部長余井塘雖是CC，但也在陳誠內閣主事，自稱「兩邊參與」。他在7月上旬看到上司意態緩和，曾要居間作東，並且托請立法委員許紹棣攜帶陳誠信函親往臺中歡迎。事後證明，尚有效果。¹³⁹

據程天放日記，7月11日晚上，陳誠約請CC主幹餐敘，到會者包括谷正綱、張道藩、余井塘、程天放、蕭錚、洪陸東、洪蘭友、許紹棣、胡健中等人，副閣揆張厲生同座。¹⁴⁰席間，許紹棣說明臺中一行得到立夫可望北返的表示，並帶回立夫給陳誠的覆函。根據許的說法判斷，此函不是立夫的親筆，似乎只是行禮如儀的材料，無論如何，國史館現藏《陳誠副總統文物》未見此信。言畢，陳誠立刻表示自己對立夫、行政院對立法院均無惡意，外界傳言不可信。一些賓客相繼表示事態嚴重，總須設法解釋誤會。胡健中則是認為兩造左右都有磨擦，徒增「惟恐天下不亂之人蓄意挑撥」的機會。在這個政治酬酢場合中，胡甚至責備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藉其職務之便，助長了前述的磨擦。這樣，透過一個「他者」的被指控，用一個宗派成見轉移另一個宗派成見，似乎讓筵席主客在一番觥籌交錯之中，短暫呈現了人造的一股修好氛圍。¹⁴¹

此時，蔣介石底定了陳立夫去國的最終意向，這才是陳誠願意從「冷戰」走向「冷和」的結構性背景。就在陳誠會晤CC主幹後，蔣介石執筆回復陳果夫前函，託請張道藩攜往臺中，內稱無須介意外界有關黨中央財務的耳語；至於立夫之事，並不是因為授權問題而起，「此或彼未與同志談及本題也」；又說，論度量，論器識，都難期待立夫擔當重任，「此為中平生失望之一事」。事實上，張道藩此行肩負了重要的傳話任務。他向二陳兄弟面述，今後總裁決不能再令立夫

¹³⁹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0日條。許紹棣攜陳誠函赴臺中，並見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39。

¹⁴⁰ 蕭錚回憶錄說這天是6月21日晚上，不確。《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39-340。

¹⁴¹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1日條。

參加黨務，將安排赴美進修。¹⁴²

早期CC分子的憶述，多將陳立夫離臺一事形塑為主動求去，高蹈遠舉，以明心志。其實不確。¹⁴³ 7月13日，陳立夫返回闊別1月的臺北。當晚在溫州街張道藩寓所，面晤胡健中、洪蘭友、余井塘、程天放諸友。這些派系同僚聽到張道藩轉述層峰意向及回函內容後，皆以「因禍得福」解慰立夫，力勸同意赴美，咸信他們的派系領導人如果能潛心讀書幾年，充實學問，並設法翻轉美國方面的刻板印象，「則政治亦仍有前途也」。不過，大家也說，當務之急是與陳誠見面，親自解明原委，釋其猜疑。¹⁴⁴

15日下午，陳誠移樽拜訪陳立夫，親聆童案與授權案的解釋，歷兩小時。晚間在胡健中寓，陳立夫向幾位CC骨幹說明兩人談話詳情，說陳誠表示也經常受到總裁責備云云，覺得陳誠似也能領會自己的苦處了。根據程天放日記，立夫向這批同志分析「辭修所重者在授權案未通過，而總裁所重者則在童冠賢辭職未派，總裁對辭修、立夫二人之合作又特不欣賞，只有怪其過大之志。」程天放接了話說，這就是自古以來領袖人物所採取的「分而治之」手法。¹⁴⁵ 似乎，幾位宦海弄潮兒認為陳立夫做為派系首腦而新近招惹的厄運，多多少少是因為陳誠組閣初期留給人們一種與CC合作太過的幻覺，而導致最高領袖所祭出的某種抑壓、懲戒之舉。雖然，這種出諸「重術派」角度的理解，失之片面，然而它不僅是暫時緩解了這些日子以來這個群體的挫折感受，而且還在這批人物的剩餘生命中，繼續發揮了某些聊以解慰的心理代償作用。¹⁴⁶

當晚，張道藩也向眾人說明了再赴臺中與陳果夫商談的情形，並傳閱果夫昨日寫就，托其面呈蔣介石的2頁復函。函稱感激「信愛之專」，但仍請同意解除

¹⁴² 〈蔣中正復陳果夫函〉（1950年7月13日），《大溪檔案黨務類》，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大黨015/007；《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3日條。《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3日條。

¹⁴³ 例如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40；陳立夫，《成敗之鑑》，頁383；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頁538。

¹⁴⁴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3日條。

¹⁴⁵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5日條。

¹⁴⁶ 例如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38、341；陳立夫，《成敗之鑑》，頁381-382。

中央財委會主委名義；又申說立夫忠誠，至於「出國進修，以擴才器」一事，「果甚為贊成，至祈早日實現，俾其能在本黨改組以前離臺當更好也。」¹⁴⁷ 順著果夫的意思，在場人士決定由張道藩請求總裁立即批派立夫出國，「俾不致夜長夢多又有變化」。他們也想到行憲伊始南京中央無法控制黨籍立委言之際，蔣介石指令陳立夫出國參加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Moral Re-Armament, MRA）及考察英、美民主政治的一幕往事，當時曾引為蔣刷新黨務空氣，懲戒這名派系首腦節制幹部無方，順帶回應美方去陳壓力等多元動機下的某種政治表示，輿論有以立夫「鐵羽出國」視之者。惟不旋踵間，陳又以「反求諸己」之姿，低調返回政壇。¹⁴⁸ 無疑的，這段經驗是CC僚友估量本次立夫暫避政治風暴後「仍有前途」的重要參照依據。這時，考量到年度性的道德重整會正在瑞士召開，而陳立夫又是該會理事與少年團名譽副會長，參與胡寓夜商的幾位CC要角決定援用前例，「最好能以受道德重整運動之邀請為名，赴瑞士，再轉美國」，或許可以避免直接赴美的尷尬。¹⁴⁹ 張道藩匯整了大家的意思，擬就簽呈，向蔣轉述陳立夫「一唯鈞命是聽」的態度，也提到立夫當年出席道德會「在反共宣傳方面頗有建樹」，建議本次「如仍令其前往一行，匪特出國名義不必另行考慮，似於私人進修與國策宣揚裨益尤多。」¹⁵⁰ 17日，蔣介石會見張道藩，確定立夫出國名義，並同意陳妻孫祿卿同行。夜間，張道藩在胡健中寓，向眾人彙報了最新發展。¹⁵¹

21日晚間，蔣介石在草山宴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前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約40餘人，當場出示改造案文件，進行最後溝通。在一些人的記述中，這場談話餐會是以異議者撩撥起東道主的情緒，以致如蔣所言「明白宣布立夫行動之誤黨與自私」而聞於後世的。會中，朱家驊、呂曉道、王秉鈞（CC）、李宗黃（CC）仍對中委停權表達異見，也希望改造委員會設在中央常會下，以免黨人離心離德。蔣介石聞後，聯想到兩個月前海外部人事兩度受阻常

¹⁴⁷ 「陳果夫復蔣中正函」（1950年7月14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1-061。

¹⁴⁸ 參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388-389。

¹⁴⁹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5日條。

¹⁵⁰ 「張道藩致蔣中正簽呈」（1950年7月15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200-00342-011。

¹⁵¹ 《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7日條；《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17日條。

會，怒而指摘黨員表面請他領導，實則毫不尊重總裁，今後如果不讓他領導，大可另行組黨，跟著陳立夫走。語間，又痛斥「常委任立法委員者不能執行黨紀，只顧個人而不顧黨國之背離言行」；再痛責中央委員「上無領袖，下無群眾，實無要求召開全會之權能」；再提醒他們「中委之群眾實只總裁一人」，「問其復有何人是其群眾」，又問彼能享有今日的權力地位，「豈非總裁之力乎」。言畢，眾皆無語。¹⁵² 22日，中央常會臨時會議採取一致起立的方式，通過蔣介石交議的改造案。在蔣的命令下，陳立夫仍未到會，其實也未便到。¹⁵³

本來，CC陣營內部並未排除陳立夫再能返回政壇的遐想，但隨著蔣介石公開展示了怨懟的立場，以及黨機器刻意做出的政策性宣示，在在使得這些遐想的空間急速縮小了不少。例如改造案通過後，親蔣人士和國民黨官方就已搶先告訴境外媒體，CC的權力將被終結，預期將可重新塑造國民黨的新生命。這種詮釋角度和國內公眾接收到的遮蔽性訊息頗為不同，它迎合了西方政界的長年要求，倒也博得了海外若干正面的報導版面。例如香港報紙聞之，「莫不有驚奇之感」；¹⁵⁴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發自臺北的電訊則高度讚揚改造，表示這個運動做為蔣介石北伐以後最徹底的措施，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除去CC系的政治生命」。¹⁵⁵

CC從未被「除去」，只是被抑制而已。即便如此，這個動作仍在國民黨的歷史長河中呈現了獨特的重大意義。25日晚上，陳誠、譚祥設宴餞別陳立夫夫婦。兩位「陳先生」並肩而坐，美國在朝鮮戰事的角色成了筵桌上的話題。席間，外交部長葉公超建議禮聘立夫為外交部顧問，即可辦理外交護照，可得許多便利，孫祿卿則希望讓獨女澤容、幼子澤寵同行，均得陳誠同意。顯然，陳立

¹⁵² 引號文字均出自《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21-22日條。其他日記，參見：「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7月21日條，頁149；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上冊，1950年7月21日條，頁350。憶述文獻，參見：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頁340；陳立夫，《成敗之鑑》，頁380；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頁362。

¹⁵³ 《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20、22日條。

¹⁵⁴ 〈國民黨改造消除派系勢力〉，《華僑日報》，香港，1950年7月25日，張1頁2。

¹⁵⁵ Taipei, July 23(AP), "Sweeping Reform of the KMT: CC Clique Goes,"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July 24, 1950, p. 1. 程天放覺得這些外電都採取了揶揄的觀點。《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24日條。參見"Alert on Formosa," *Time*, July 31, 1950, pp. 20-21.

夫已有長住海外的心理準備。¹⁵⁶ 26日，蔣介石宣布中央改造委員16人名單。其中，親陳誠、蔣經國的勢力以及官邸派，共同構成了黨中央新人事的三本柱；至於CC，只見張道藩、谷正綱、胡健中3人而已。又，在稍後組成的中央改造委員會裡，親陳誠的黃復青勢力同樣掌握了多數的工作組；經國勢力亦可觀，也能和當中的部分黃復青、官邸派交通。看來，新中央「不入於楊，則入於墨」，至於CC人物雖未絕跡，然而已是黨務之薄祚寒門矣。¹⁵⁷

數風流人物，果夫苦病，立夫見逐。這段期間，一些CC分子籌謀將來，曾打算尋覓一位新的領導重心，藉以維繫組織。30日，前中統局長葉秀峯等人造訪程天放寓所，就提到這個想法。程的日記：「秀峯謂立夫出國後黨中同志應以余為中心以謀團結。余堅決表示不願有此種事，蓋不但不能團結，恐更將分裂，只有以一部份為中心，始可談到團結。」¹⁵⁸ 所謂「以一部份為中心」，無非是集體領導或是共同承擔的意思。程天放之無意成為派系「單核心」，除了憂慮分裂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考慮，尚不得而知。倒是根據梁肅戎的憶述，此時陳立夫似乎覺得張道藩、胡健中、余井塘、程天放等人都有「一個個」被中央「拉走」的嫌疑，反而是將立法院的齊世英視為一個「點」而寄以厚望。齊世英和程天放同庚，和張、余也不過小個兩三歲，都是同一個世代。驗諸來日史實，齊當然不能算是CC全體的新領導重心（實際上也沒有這號人物），但至少在校院內，真的讓他「領了一批人」，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重點」了。¹⁵⁹

8月3日下午，蔣介石尚在官邸考慮中改會各組長人選，得知翌日就要搭機離臺的陳立夫前來告別，只請宋美齡代為接見，而立夫又談立法院事。¹⁶⁰ 多年來，以果夫、立夫兄弟和CC為題材的通俗著作，經常眾口一聲又未標明資料來

¹⁵⁶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25日條。

¹⁵⁷ 楊墨之說，參見：雷震，「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第2冊，1950年7月27日條，頁154。

¹⁵⁸ 《程天放日記》，1950年7月30日條。

¹⁵⁹ 梁肅戎口述，劉鳳翰、何智霖訪問，何智霖記錄整理，《梁肅戎先生訪談錄》，頁78-86。

¹⁶⁰ 「頗費心力」、代為接見：《蔣介石日記》，1950年8月3日條。代為接見、立法院事：《程天放日記》，1950年8月4日條。參見梁肅戎口述，劉鳳翰、何智霖訪問，何智霖記錄整理，《梁肅戎先生訪談錄》，頁71。

源的寫到宋美齡送立夫一本聖經，說：「你在政治上負過這麼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裡有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去唸唸，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慰藉。」又說立夫的反應出乎宋的意料，這位流放者指著牆上的總統肖像，低沉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其實這段對話內容完全抄錄自江南《蔣經國傳》，該書也沒寫上資料出處，真實性尚待尋考。可堪注意的是，一位經國傳記作者寫到這事，無非是要強調「非趕走CC的勢力，才能剷除經國當權的阻力，那是父親的意思。」¹⁶¹ 其實經國當權之路，與之存在著競爭關係的「阻力」仍多，其父也未必要、未必能悉數「剷除」之，所謂「趕走CC」才能剷除之說，未免雙雙簡化了陳立夫去國之謎，以及經國通往權力之路的解答。

捌、結語

1950年陳立夫奉令離臺，是兩個重大背景交疊下的結果。一是美國方面屢屢提示國府若干人事黜免的意見，佐驗改革決心，視為援助的前提。二是國民黨黨國體制遷臺重建之初，究竟應該如何估量派系代理的職能表現，及其結構性角色的再安排。

早從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美國以盟國領導身分介入中國政局後，陳立夫與CC所持黨義優位的立場，就已成為國府爭取美方同情的負值因素之一。爾後，隨著美國外交決策部門對國府態度的起伏變化，以及國府在國共內戰迄于遷臺初期的黨政演變，去陳與否，實際上經過了一個讓蔣介石猶疑而最終祭出鐵腕的複雜過程。

國共內戰期間，國府內部治絲益棼而又需求美援方殷，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多次借勢，建請蔣介石飭令陳立夫出洋、解散CC。蔣雖不滿於陳無能節制其派系僚屬、增益統制效能，然以現實需要與歷史情感，尚能涵容一時，對美方關切只在依違兩可之間。來臺後，美方又餌以前景並不清晰的援助，要求表明陳立夫等

¹⁶¹ 江南，《蔣經國傳》（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266。

官員的政治責任，蔣介石疑猜之餘，猶肯視作突破「袖手政策」的契機，曾有「毀黨造黨」的改造規畫，未來不再交付新黨的黨務代理權給陳。惟蔣的改造藍圖未能得到黨內一致支持，CC尤以民主為尚，力展異趣，又值軍事緊張，只能暫時擱置，立夫的命運尚懸一線。

在黨國體制嵌入臺灣盤整之初，果夫、立夫兄弟及其派系的政治活動空間明顯內縮化。他們不僅喪失了國民黨中國時期最可賴以立足的地方組織基礎；做為黨國贍養資源的一支重要代理勢力，對於殘破的黨營與部分國營事業的修補，也顯得左支右絀；面對陳誠在臺先後發揮影響力的黨政部門，諸如省府、省黨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等，更不容易朋分人事；在立法院，CC甚至遭到中社等新起次團瓜分，退居第二派系，也未必能夠保證其院內表現足可滿足蔣介石的領導意志與紀律要求。

陳立夫、CC在立法院事務方面和行政領導當局的嚴重牴牾，是催化其失勢的最終關鍵因素。進一步看，可以發現CC空間內縮而猶思進取之餘，等於是逆勢挑戰了蔣介石同陳誠在臺灣共同鋪設的統治基盤，及蔣一再傷逝的黨國內部秩序想像。在憲政與戡亂使命並舉的政制結構下，做為施政重心的總統與行政院長，存在著「體（政制）用（施政）共生」的實務關係，加上黨內家父長式領導文化的支撐，勢必損及國會制衡功能的發揮。加上國民黨直到遷臺之初，國會控制、動員都還不是透過黨團（事實上尚未設置），而是由蔣直接召集會談，經由派系對口，貫徹政令，多少顯示出某種遷就派系分據的現實況味。因此，立委的異見，無論出於公私動機，往往在形實兩端都更容易裂變為和蔣個人意志之間的直接對抗。及至童案和授權案併發，蔣再難優容，欲以陳立夫為祭旗，創造對美外交和內部鞏固的政治利潤。又鼓動輿論，重啟黨務改造的進程，特點一：伸張總裁斷然形塑改造面貌的特權；特點二：捐棄派系平衡的舊式統馭作風，壓抑CC的政治影響力。韓戰爆發，臺灣捲入國際冷戰二元對立結構而重新獲得美國白宮正視防衛需要，蔣再無顧慮，開始實施改造，流放立夫，抑制CC，積極貫徹自己在黨國體制的領導威權地位，正式強化陳誠與黃復青勢力在黨政新空間的角色，同時也夾帶了經國勢力在黨務部門的流動、上升。

本文引用一手檔案做為國民黨派系研究的主要材料，不只有利於探明更多的

史實細節及其烘襯的時代結構、局勢，也較有機會藉此（而非憶述取材導向）延伸視野，繼續探究若干可待著力的研究課題，以及陳立夫去國所輻射出的政治意義。例如：

一、宗派主義中的政治耳語文化：

相對於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遷臺初期的派系活動空間和黨國體制的政經資源都呈現了內縮化的傾向。其中，CC的空間內縮化更為明顯，加上他們的外部處境相對窘迫，而仍然一本「出路情結」伺機擴展觸角、爭占資源，當然引人側目。

目前為止，政治耳語還不是國民黨派系研究特別關注的學術議題，未和它的實際作用比重相埒。在國府風雨飄搖而耳語內漫的年代，特別是美方指名關切的政治壓力下，總可看到CC（做為一個集合名詞及其個別人物）經常浮沉在黨政菁英日常的舌根混嚼之中。人們一邊月旦這批勢力代理黨務、黨國資本事業失敗的責任，一邊談論他們猶在進取政經資源的舉動，然則派系成見的忘情發酵有之，乘間投隙也有之。

黨政圈的耳語流動，經常質疑CC成員的政治忠誠，有時藉私人清談而轉手傳播，有時直接透過上行的密報，所陳述的內容最是觸動傳統君臣倫理的神經。最後，蔣介石已以「忘國」、「侮黨」視之CC，等於不忠，又以「鬼崇」評價陳立夫，等於不誠，黨政傳媒則以不指名的方式配合追剿，等於是將層峰的政治不滿升級為公共輿論，語言之赤裸足可令政壇人士測定風向。總的看來，國民黨治理內幕中的耳語傳播過程、政治作用仍是歷史學界相對陌生的，值得我們結合一手檔案等多元史料觀察。

二、陳立夫去國之於黨國上層體制的重大效應：

當代歷史和社會科學界早已指出，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國時期所建立的派系均勢代理結構，來到臺灣後產生了重要變化。事實上，1950年8月4日陳立夫的去國，正象徵了此一結構20多年來的最大變動，不僅是黜免了一個長期代理黨部組織事務的要角，抑制一個長期活躍的派系，在黨國上層體制中，甚至開啟了派系替代的政治工程。

國民黨在臺灣推動首次黨務改造以後，以陳誠、蔣經國勢力為泛指的前三青團幹部建立嶄新可觀的政治地位，瓜代了CC的傳統影響力，也在立法院形塑了一支長期擁戴中央的執政派隊伍。至於CC分子一向以辦黨的「忠實同志」自居，條地蒙上「侮黨」之「侮」，見斥於主流之外，則其怨望、孤憤之深，反而開出了「公道情結」與體制內異議的混同循環，所謂「假藉改造為名，在威權政治掩護下，任意壓抑一大片，而扶植一小撮」的說法，可窺彼輩一二心理。¹⁶²至少在1950年代，上述混同循環的存在，正是國會宗派主義得以披上民主道德外衣，揚舉國會制衡理念的大纛而繼續抵擋黨國體制行政權擴張的主要動力，也可看出陳立夫被迫去國以後，那些從黨國派系代理結構內部的裂變所發出的政治異質聲音，對於我們思考戰後臺灣民主自由「如何可能」的一頁演進史時，似乎仍是值得重新認識、參照的一個重要背景課題。¹⁶³

¹⁶²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頁536。

¹⁶³ 參見王良卿，〈蔣介石和1958年出版法修正案的審議風潮〉，頁694。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大溪檔案黨務類》（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黃少谷、谷正綱致蔣中正簽呈〉。
 - 〈蔣中正復陳果夫函〉。
- 《立法院會速記錄》（臺北，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藏）
- 〈第一屆立法院第三會期第二十三次會議速記錄〉。
 - 〈第一屆立法院第三會期第二十四次會議速記錄〉。
 - 〈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十六次會議速記錄〉。
 - 〈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十七次會議速記錄〉。
 - 〈第一屆立法院第五會期第二十八次會議速記錄〉。
- 《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中央常務委員談話會要點〉。
 - 〈中央第二三五次常會各委員意見摘要〉。
 - 〈在臺北中央委員談話會要點紀錄〉。
 - 〈吳敬恆等二一五人聯名呈請總裁斷然決策改造本黨案〉。
- 《雷震、傅正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王世杰致雷震代電〉。
 - 〈黨的澈底改造問題〉。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二）〉。
 -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二）〉。
 -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三）〉。
 -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
 - 〈一般資料—專件（三十三）〉。
 -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三）〉。
 - 〈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三）〉。
 - 〈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業務會報紀錄〉。

-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
- 〈金融（五）〉。
- 〈革命文獻—戡亂時期黨務〉。
- 〈革命文獻—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二）〉。
- 〈經濟報告（一）〉。
- 〈對美關係（五）〉。

二、史料彙編

-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
- 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年。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 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三、日記

（一）未刊本

- 《程天放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 《黃鎮球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二）刊印本

- 「雷震日記」，雷震，《第一個十年》，第1、2冊。臺北：桂冠圖書出版有限公

- 司，1989年。
- 「閻錫山日記」，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錄》。臺北：編者印行，1997年。
- 「羅家倫日記」，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10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 陶晉生編，《陶希聖日記》，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 謝幼田整理，《居正日記書信未刊稿》，第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7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 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訪問，張朋園、劉鳳翰紀錄，《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 董霖，《六十載從政講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
- 壽勉成，〈陳果夫與國民黨的合作運動〉，《文史資料選輯》，總第8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
- 趙自齊口述，遲景德、吳淑鳳訪問，吳淑鳳記錄整理，《趙自齊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0年。
- 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編》，第6冊：兩岸三地卷（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
-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1980

年。

薛月順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

五、雜誌、報紙

《中央日報》，臺北，1949-1950年。

《華僑日報》，香港，1950年。

《新聞天地》，香港，1950年。

《臺灣新生報》，臺北，1950年。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1950.

Time, New York, 1950.

六、專書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

江 南，《蔣經國傳》。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

秦孝儀總編纂，李雲漢、呂芳上、劉維開、邵銘煌編輯小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9。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七、期刊、專書論文

王良卿，〈蔣介石和1958年出版法修正案的審議風潮〉，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下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呂芳上，〈痛定思痛：戰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1947-1950）〉，收入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會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